

党政干部参考

（原名《党政干部文摘》）



主管 中共中央党校
主办 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
中共中央党校函授学院
协办单位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

总编辑 / 社长 陈高桐
常务副总编辑 周 慧
副总编辑 张 莹
副社长 武志国
编辑部主任 史小平
本期责编 张 莹
封面设计 关小雷
设计制作 崔金杰
责任校对 苏彰秦
封面题字 权希军

编辑出版 《党政干部文摘》杂志社
杂志社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100号
中共中央党校综合楼

邮编 100091
电话 (010) 62805451 (兼传真)

E-mail dzgbwz@sina.com

国内统一刊号 CN11-5922/C

国内发行 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 2-490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海工商广字第0301号

印刷 北京市凯鑫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零售价 6.00元

要论

3 胡锦涛：

建设科学严密完备管用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

学习与研究

4 “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多维解析 / 辛向阳

8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和本质

/ 罗文东

高层言论

10 俞正声：领导干部要对群众讲真话

10 苏 荣：培养高尚的人品和官德

11 朱海仑：“一把手”应提高的5种能力

11 王辉忠：对恶意倾向性报道要依法追责

反腐倡廉

12 突出反腐四大制度建设

14 《预防腐败法》出台前夜：广东一把手分权

16 腐败与反腐败的较量

——2009年腐败现象与反腐败行动的特点

/ 林喆

经济纵横

19 中央布局弥补经济五大“短板” / 方竹兰

20 经济“调结构”要过“五道坎”

22 三角形：中国经济的理想模式 / 唐双宁

农业·农村·农民

23 七策发力“三农”薄弱点 / 赵涛

25 让更多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市民

/ 王克忠

27 城镇化 应配套土地制度改革 / 郑风田

热点聚焦

28 中国住房政策的症结何在 / 郑永年

- 30 找准房价飙升根源对症下药 / 易宪容
31 解决高房价问题是一个长期过程 / 宣宇
33 世界各国抑制房地产泡沫之鉴 / 吴继兰

观察与思考

- 35 潜在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 金名
37 中国海权面临挑战 / 孔志国

时政评要

- 40 高行政开支，削弱国家竞争力
41 “诚信”贪腐是官场的黑色幽默 / 周虎城
41 官员应酬风的一果多因 / 江曾培
42 问责常规化，不放过庸官懒官太平官
43 谁把房地产商宠成蛮横的孩子 / 成露
43 网民成为压力集团是国家进步的象征
/ 祝华新

百家言

- 44 宽容是一种让人感动的美德和大爱 / 白丁
45 站立的心灵 / 胡运生 胡运鑫

海峡两岸

- 46 从政治乱象看台湾政治市场及其影响
/ 朱松岭

环境保护

- 47 低碳生活，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 吴学安

环球瞭望

- 49 “蚁族”，世界大城市的难题

最新书摘

- 51 中国力量的三面

文史苑

- 53 闲话古代官员的退休生涯 / 完颜绍元

信息窗

- 55 昆明公职人员劝酒将被问责
55 重庆法院推行领导干部“单方退出”机制
55 宁夏将专项治理跑官要官“顽症”
56 政府采购人员与供应商负责人
不得有三代内旁系血亲关系

数据库

- 56 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公布
封三 中央纪委监察部通报 2009 年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工作情况
去年 7036 名领导干部被问责

撷英咀华

- 封二 路的感悟 / 杨树荫
封底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

胡锦涛：

建设科学严密完备管用的 反腐倡廉制度体系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1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全党必须正确认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既充分看到反腐倡廉建设已经取得的显著成效，又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坚决的态度、更加有力的措施、更加扎实的工作，坚定不移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推向前进。

胡锦涛强调，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必须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加强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为重点的作风建设，加强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的反腐倡廉建设，抓紧解决反腐倡廉建设中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着力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开拓创新、狠抓落实，不断取得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成效。

胡锦涛指出，当前，要重点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第一，加强对中央关于推动科学发展重大决策部署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及时发现问题、督促整改。第二，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教育监督，以党性党风党纪教育为重点，加强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和廉洁从政教育，大力弘扬党的优良作风，继续引导领导干部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第三，认真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和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严肃查处严重侵害群众利益案件，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第四，坚决查处违纪违

法案件，严肃查处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滥用职权、贪污贿赂、腐化堕落、失职渎职案件，决不让任何腐败分子逃脱党纪国法惩处。

关于制度建设，胡锦涛强调，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是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紧迫任务。要以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各项制度为重点，以制约和监督权力为核心，以提高制度执行力为抓手，加强整体规划，抓紧重点突破，逐步建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切实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制度实效。

胡锦涛指出，要突出抓好以下4个方面工作。一是要进一步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制度建设，加强和改进教育培训工作，加强和改进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反腐倡廉教育的科学性、规范性、有效性。二是要进一步加强监督制度建设，认真执行和不断完善各项监督制度，改革和完善党内监督体制，健全权力运行监控机制，拓宽监督渠道，增强监督合力，加大监督制度创新力度，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三是要进一步加强预防制度建设，推进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建立健全预防腐败信息系统，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形成有效预防腐败的长效机制。四是要进一步加强惩治制度建设，建立健全腐败案件及时揭露、发现、查处机制，建立腐败现象易发多发领域调查分析和专项治理制度，健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及其配套制度。

关于制度创新，胡锦涛强调，形势在发展，实践在深入，人民群众对反腐倡廉提出了新要求新时期

“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多维解析

辛向阳

从历史上看，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存在着多种解析。

一、什么是社会主义：表象性解析

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在1827年出现以来，各色各样的理论家对它进行了一系列界定，其说法可谓是五花八门。1924年英国社会科学家格里菲斯写了一本书《什么是社会主义？》，书中汇集了近百年中（1827年—1924年）出现的260种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基督教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讲坛社会主义、议会社会主义、封建社会主义、工联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市政社会主义、芬尼亚社会主义、合作社会主义、政府社会主义、伦理社会主义、警察社会主义等）。从1924年以来，历史又过去了80多年，在这一阶段中又出现了上百

种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人性社会主义、参与制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新社会主义、后社会主义、法国式社会主义、佛教社会主义、儒家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基布兹社会主义、福利社会主义、职能社会主义、基金社会主义、阿拉伯复兴社会主义、农业社会主义、21世纪社会主义，等等。

所有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定义，都只侧重于社会主义的某些现象的描述或者说是某些情景的想象。例如，托洛茨基在1920年曾经这样描述社会主义：“公共食堂把食物做得又好又有营养、美味可口，以供大家选择；公共洗衣店很好地为大家洗涤漂亮的衣衫；儿童们吃得饱饱的，健康而又快乐，所有儿童都能吸收科学和艺术的基本营养，就像吸收蛋白质、空气、太阳的温暖

待，这些都要求我们及时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创新。要深入研究反腐倡廉建设的突出问题，按照与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相适应、重大举措相配套的要求，配合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来进行。

胡锦涛指出，切实抓好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必须不断提高制度执行力。各级党委、政府和纪检监察机关要切实加强制度执行的组织领导，保证反腐倡廉各项制度得到切实执行。要切实加强制度宣传教育，增强全党制度意识，筑牢遵纪守法思想基础，把制度转化为党员、干部的行为准则、自觉行动。要切实加强制度执行情况监督检查，切实查处违反制度的行为，着力在领导干部特别是高中级干部中

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没有特权、制度约束没有例外的意识，教育引导领导干部带头学习制度、严格执行制度、自觉维护制度。

胡锦涛强调，纪检监察干部要注重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和能力建设，增强政治意识、表率意识、法治意识、创新意识、宗旨意识，忠诚于党和人民事业，坚持党性原则，忠实履行职责，带头遵守和维护党纪政纪国法，对腐败分子和消极腐败现象进行坚决斗争。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并自觉承担起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的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加强对纪检监察工作的指导，支持纪检监察机关履行职责、开展工作，帮助解决纪检监察机关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推动落实反腐倡廉各项任务。

（摘自2010年1月12日《新华网》）

一样；电和无线电不是像现在这样以手工业方式工作，而是像一道集中了大量能量的无穷无尽的瀑布那样，听从计划的按钮工作；没有‘吃闲饭的人’……”。

由于提出这些定义的学者们不能了解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进程，他们不但抓不住社会主义的实质，而且往往连社会主义的外在特征也无法认识清楚，这就导致他们得出了很多荒谬的结论，例如H·斯宾塞讲“社会主义就是奴役”，冯·哈耶克讲“社会主义就是通向奴役的道路”。约翰·穆勒在1869年写的《社会主义残章》中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时讲：社会主义“就是废除所有政府，而且从财产所有人得到所有的财产权”，社会主义就是“多数对个性的压制”。

二、什么是社会主义：科学性解析

马克思恩格斯在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的同时，第一次对社会主义作了科学的界定。他们由于没有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还不可能从社会主义本身发展规律的角度来论述社会主义，而是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比较中，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逻辑中，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中来论述社会主义。他们认为，既然社会主义是代替资本主义的制度，那么，与资本主义制度（私有制、无政府生产、按资本分配等）相反，社会主义制度就应当是：公有制、计划生产、按劳分配。

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论述具有这样几个特点：（1）它是从未来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角度来论述社会主义的。恩格斯讲：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2）它强调社会主义是不断变化的社会。恩格斯讲：“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它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

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3）它强调社会主义还在多方面有“旧社会的痕迹”。在1875年写成的《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对未来社会发展阶段的设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认为，在经历了“长久的阵痛”这个过渡时期，即由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革命转变时期之后，共产主义社会将依次通过两个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不可逾越的必经阶段，只有在第一阶段里，使生产力有了高度发展，道德、精神等方面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之后，才能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这个社会，在经济上，生产力水平还不高，新的公有制生产关系的建立虽然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但是发展生产力是个长期过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生产力水平及其提供的社会产品仍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要，在精神和道德上资本主义社会的影响也将长期存在。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工农、城乡、脑体差别的影响，人们还不能自愿自觉地参加劳动，劳动对大多数人来说，不是生活的第一需要和自己内在本质的表现，而是仍然被视为谋生手段。

这些科学论述涉及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但由于历史条件限制，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也不可能提出社会主义本质的概念和系统的理论论述。

三、什么是社会主义：改良性解析

1918年12月28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重要代表人物伯恩斯坦在柏林的一次由公民和经济教育协会举办的集会上发表了一次讲演，题目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伯恩斯坦引用了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引论中对于社会主义的解释，恩格斯说，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

立以及生产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但是，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在引用完这段话后，伯恩斯坦说：“这一解释给人的突出印象是什么？谁只要仔细地检查一下，就会说：这里仍旧缺少对于这一内容本身的特性和本质的任何确定说明。只说了社会主义是从什么观点起源的，它表现为什么，但没有说出它实际上是什么？”伯恩斯坦离开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轨道，用改良主义的眼光来看待恩格斯的社会主义论述，所以得出了上述结论。

那么在伯恩斯坦眼中，什么是社会主义呢？他讲：“如果我把在这里所发挥的一切总结一下，那么我要给社会主义这样下定义：

“社会主义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认识了自己的阶级地位和本阶级的任务的工人的社会要求和自然意向的总合。”

他又说：“这些要求的精神总合、思想内容，我再讲一遍，这就是社会主义。”伯恩斯坦的社会主义是所谓“工人阶级在其活动的各个方面所取得的一整批经济和政治胜利的结果”。这样一来，社会主义就成了改良主义。

四、什么是社会主义：现实性解析

列宁将社会主义从科学理论变成了活生生的实践，并领导俄国进行了7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对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进行了积极探索，对社会主义有了很多新的认识，由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一般性认识发展为具体性认识。列宁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公式：

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 + 普鲁士的铁路秩序 + 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 + 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 ++ = 总和 = 社会主义。

他还提出过：

社会主义 = 苏维埃政权 + 电气化；

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阶级；

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剥削。

更为重要的是列宁特别强调根据经验、实践来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他指出：“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这些论述深化和丰富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但列宁还没有来得及将这些具体认识上升为一般的理论认识就逝世了。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作了弥足珍贵的探索，并把一些具体认识科学地上升到一般理论，如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中国式社会主义的理论等。但由于实践与认识的局限，他也没有能够完整、全面、科学地揭示什么是社会主义。

五、什么是社会主义：价值性解析

社会主义是什么？社会主义就是一种价值的存在，一种向世界宣示其存在的客观价值。古巴是这方面的典型，卡斯特罗讲：社会主义是榜样的科学。虽然古巴在经济上非常贫困，但是其婴儿死亡率却低于许多工业化国家，并且一些在发达国家常见的疾病在古巴被消灭了。古巴的收入水平只是加拿大的1/10，但其婴儿死亡率却与加拿大持平。这令世界银行的专家感到费解，把这称之为“古巴之谜。”

其实，古巴这种“没有经济增长也能使人民拥有健康”的成就主要来自于社会制度的价值取向：全民和公平的医疗保健是政府要实现三个最高目标之一。毛相麟研究员在2005年出版的《古巴社会主义研究》一书中讲：“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法令的规定，这些方针、政策（指医疗卫生政策）可概括为以下几项基本原则：第一，享有医疗卫生保健服务是全体公民的权利，保障这一权利是国家的责任。第二，全体居民都参与医疗卫生保健

体系的运作和发展。第三，将医疗卫生保健工作同全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结合起来，协调发展。其中最重要的原则是上述第一条。根据这一条的精神派生出两项基本政策：第一，医疗待遇人人平等；第二，全部免费，一切由国家负担。”正是这种价值取向使古巴把社会主义更多地理解为公正的社会制度。

六、什么是社会主义：本质性解析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紧密结合中国实际，邓小平理论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思想。邓小平同志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对社会主义的科学认识为基础，总结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中社会主义的实践，第一次在科学社会主义史上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这一概念，并作了完整论述。1980年5月15日在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时，邓小平同志首次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这一概念。他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以后他多次使用这个概念，并进一步思考社会主义本质的内涵。1985年8月，邓小平同志指出：“对内搞活经济，是活了社会主义，没有伤害社会主义的本质。”1990年12月，邓小平同志又进一步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1992年2月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明确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由此而产生。社会主义本质是社会主义概念中最深刻、最稳定、最高的层次，它是贯穿于社会主义发展全过程，体现社会主义根本目的的基本规律和基本制度。有一些制度虽然在一定时期内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但它不一定贯穿于社会主义的全过程，这些制度就不能看作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制度。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反映了人民的利益，廓清了

不合乎时代要求的模糊认识，摆脱了长期以来拘泥于具体模式而忽略社会主义本质的倾向，深化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完善了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认识。胡锦涛同志在2006年8月15日学习《江泽民文选》报告会上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紧密结合时代发展的新形势、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实践，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形成了富有独创性的理论成果。”

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拓展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社会和谐是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方面，作为本质属性，它展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这也是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拓展。社会主义是一个政治生命体，民主是这个生命体的心脏。2008年12月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胡锦涛总书记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提出了两个新的科学论断：坚持效率和公平有机结合才能更好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

要科学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就必须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社会主义的本质与特征；必须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立场上，站在任何别的政党立场上来看待社会主义，必然会背离社会主义的本质；必须紧密结合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条条框框出发来确定社会主义的内涵与实质。

（摘自2009年第24期《红旗文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和本质

罗文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丰富的内涵，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现实依据、根本途径、主要任务和根本目标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它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两个重要前提”，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立足基本国情。中国共产党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毛泽东早在1957年5月就说过：“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也强调：“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才能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才能顺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第二，“一条基本路线”，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条基本路线集中体现了我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意志，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规律，因而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其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对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的规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安排，坚持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直接动力。三者相互依存，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

第三，“两项根本任务”，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看作是建立新社会的“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邓小平多次强调，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我国之所以要实行改革开放，也是为了克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调整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和环节，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

第四，“一个总体布局”，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社会主义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协调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扩展为包括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党的十七大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在经济建设上，最重要的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政治建设上，最重要的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文化建设上，最重要的是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努力使人民基本的文化权益得到保障，使社

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在社会建设上,最重要的是以改善民生为重点,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上述四个方面,相互联系、有机结合,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完整内容。这四个方面,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和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的科学总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鲜明特色

党的十七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一重要论断,揭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属性。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从思想渊源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继承和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这条道路坚持了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和价值追求,坚持了以工人阶级政党为领导核心,坚持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体地位,坚持了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根本任务,坚持了共同富裕的目标,坚持了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坚持了以人民当家作主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等等。这些方面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精髓和实质。同时,这条道路又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制度、体制和做法等方面,对科学社会主义进行了探索与创新。例如,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

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等。这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科学社会主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使社会主义在中国获得了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面对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我们党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30多年来,我国在改革开放中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了时代潮流。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世界和平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与人类文明进步紧密联系在一起,顺应了世界大势,体现了时代要求。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族形式是社会主义本质内涵的具体表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生命力只有通过适当的、有效的民族形式才能得到充分发挥。由于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且人口多,耕地少,发展不平衡,这样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必然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联产承包、乡镇企业、经济特区、“一国两制”以及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等,都带有显著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正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才得到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摘自2010年1月19日《光明日报》)

俞正声：

领导干部要 对群众讲真话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1月9日谈到群众观点时指出，要群众相信你，必须对群众讲真话，特别是要勇于承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

俞正声是在此间召开的九届上海市委十次全会上讲这番话的。他指出，工作中不可能没有缺点和错误，特别是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不承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其结果是丧失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动摇执政基础。承认缺点和错误是自信的表现，是有觉悟的表现，是取得群众信任的第一步，是改正缺点和错误的前提。凡是群众关心的问题，如果我们有缺点和错误，一般都应该公开地作自我批评。他强调，能不能作自我批评，实际上是能否正确对待“面子”和“位子”问题。想想人民的利益，想想历史的重任，自我批评也就不难了。

俞正声指出，群众观点的强弱，实质上是对群众感情问题，是世界观和宗旨意识的问题。他说，我们和我们周围的许多人，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早已解决了温饱问题，对一些群众生活之艰难可能缺乏切肤之痛。这些局限，容易使我们以个人的体验代替群众的感知，以发展的艰难作为难以解决民生困苦的托词，以过高的利益诉求掩盖群众工作的不力，以舆论的炒作回避对工作过失坦诚的检讨。

俞正声表示，现实中确实存在着发展的局限、过高的利益诉求、舆论的炒作等，但不能以此减轻我们应负的责任。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应该设身处地为困难群众着想，设身处地为工人、农民着想，设身处地为年轻人着想，并以此成为激励我们努力发展的动力、战胜挫折的勇气、奋勇争先的志气和改革创新的活力。

（摘自2010年1月10日《中国青年报》）

苏荣：

培养高尚的 人品和官德

近日，江西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就加强领导干部道德修养有关问题举行专题学习会。江西省委书记苏荣主持并讲话。

苏荣在主持学习时指出，做人要讲人品，为官要讲“官德”。当前，摆在各级领导干部面前一项紧迫的任务，就是要注重加强人格修养，陶冶高尚的道德情操，培养高尚的生活情趣，树立高尚的人生追求，坚持正确的政绩观、人生观、价值观，真正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用在为党分忧、为民造福上。

苏荣说，党员领导干部加强官德建设，就要自觉做到自我教育、自我提高，培养高尚的人品和官德，用模范言行奠人格之基、率风气之先、垂道德之范。要有崇高的信仰。领导干部要用科学理论武装自己，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要有强烈的公仆意识。官德的核心，就是权为谁所用的问题。领导干部在运用权力时一定要像“如履薄冰、如临深渊”那样谨慎行事。要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做到正正派派做人，扎扎实实工作，清清白白为官，勤勤恳恳学习；一定要做到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干出一番经得起时间检验、对得起道德良心的一流业绩，既无愧于组织、无愧于群众，也无愧于历史、无愧于自己；一定要做到心地坦荡，光明磊落，表里如一。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培养和强化自我约束、自我控制的意识和能力，在各种诱惑面前不动心，尤其要管好自己的生活圈、交往圈、娱乐圈。特别是在无人监督时，应该自觉地慎微、慎独、慎欲、慎初。

（摘自2010年1月2日《中国纪检监察报》）

朱海仑：

“一把手”

应提高的5种能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省委常委、乌昌党委书记、乌鲁木齐市委书记朱海仑日前在乌鲁木齐市委九届八次全委扩大会议上说——

“一把手”是各级班子的组织者、运筹者、指挥者和协调者，在班子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提高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素质能力，关键在于抓好各级班子的“一把手”。德才兼备是当好“一把手”的基本素质。“一把手”在具备基本素质的同时，还要着力提高5种基本能力：

一是思考问题的能力。善于思考，有思想、有观念、有主张；二是看清事物的能力。要站高看远，有前瞻性，能把握大局，有算大账、管长远的战略思维；三是容人容事的能力。“一把手”不能自以为是，更不能自以为大，要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带领“一班人”在不争论中干事，在不折腾中发展，在不干扰中前进；四是工作实战能力。在具体工作中会操作、会管理，敢作为、善作为，能预测、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五是严以律己的能力。管好管住自己的能力越强，形象越好，威信越高。

选贤任能，考量“一把手”的才智。用好一个人，影响一大片，用错一个人，打击一大片。这就要求“一把手”能及时发现人才、使用人才，对特别优秀的、群众公认的，要及时使用，用当其时，用当其位，用其所长，化短为长，以正确的用人导向激励干部干事业。

“动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动人以行者，其感必速”。“一把手”不能光说给别人听，更重要的是带头做给别人看。为民宗旨、实事求是领导干部要始终牢记的两条主导思想，任何时候都不能偏离。克服私心杂念、心浮气躁，制止歪门邪道、急功近利，在困难面前要勇于进取，在责任面前要敢于担当，把心思用在干实事、解决实际问题上，真正做到一心为公，一身正气，一以贯之，一往无前。

（摘自2010年1月12日《人民日报》）

王辉忠：

对恶意倾向性报道

要依法追责

浙江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厅厅长王辉忠在近日召开的全省政法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清醒地认识网络媒体对社会敏感热点问题炒作频发给政法工作带来的新挑战。

他说，目前，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除了BBS之外，博客、微博客、视频技术等网络传播手段不断涌现，现实社会中的问题越来越多地在“虚拟社会”中聚集、放大，并反过来影响现实社会，形成社会热点。如何应对网络媒体炒作，确保严格公正执法，是政法机关必须认真对待、着力破解的突出问题。

王辉忠强调，要切实加强司法意识形态领域工作。各级党委、政府要从有利于维护和谐稳定、有利于维护司法公正、有利于维护政法队伍整体形象出发，正确把握政法宣传舆论工作的政治方向，占领主阵地，弘扬主旋律，组织有关部门共同做好政法宣传舆论工作，确保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当前，要着重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坚决防止一些新闻媒体进行司法个案和群体性事件的炒作，坚决防止被境内外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制造事端，对社会稳定产生不良影响。

王辉忠强调，对媒体恶意倾向性报道的，要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最高法院最近对违反法律规定，对正在审理案件报道失实或者恶意进行倾向性报道，对接受当事人一方请托，歪曲事实，恶意炒作等情形，作出了依法追究相关责任的规定，浙江省各级政法机关特别是法院系统要认真抓好落实。

（摘自2010年1月14日《法制日报》）

突出反腐四大制度建设

1月11日,第十七届中央纪委五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此次会议明确指出,制度建设是反腐倡廉工作的重点之一。

权威专家指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既是党的制度建设的重要方面,又是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保障。近些年来,反腐倡廉制度建设领域不断拓宽、成效不断显现,但这些年查处的大量违纪违法案件和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情况表明,现有的反腐倡廉制度还不健全,还存在不少漏洞和缺陷。

在高层看来,当前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方面的不足主要有四: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还存在制度空白,有些问题存在已久,但解决问题的制度没有及时建立,跟不上形势发展需要;一些制度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过于原则宽泛,缺少具体实施措施;一些制度缺乏系统性和配套性,不能有效发挥作用;不少制度没有得到很好执行,存在着重制定、轻执行现象。

针对这些问题,胡锦涛总书记在此次会议上发表讲话,多次强调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并要求突出抓好四个方面即反腐倡廉教育制度、监督制度、预防制度和惩治制度建设。

反腐倡廉从教育抓起

根据中央要求,反腐倡廉建设必须从教育抓起。作为加强教育制度的举措,是以加强领导干部教育为重点,不断完善相关制度,提高反腐倡廉教育的科学性、规范性、有效性。

党建专家、中央党校教授叶笃初分析说:“强调提高反腐倡廉教育的科学化水平是一大亮点。这不仅仅局限在教育制度建设上,四大制度从文件形态到效力形态都要在科学化上下大功夫。只有这样,我们现在正在努力建设的制度才能做到管用、有效。”

加强和改进教育培训工作,完善示范教育、

警示教育、岗位廉政教育等制度,丰富教育内容,改进教育方式,提高教育实效,形成科学有效的反腐倡廉教育培训机制,也是加强教育制度的重要部分。

“关键就是要解决教育培训的实效问题。”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林喆分析说:“实际上,当前对各级干部的教育培训一点都不少,但为什么在一些地方作用不显,效果不佳,原因就在于很多教育培训重形式而轻内容,重灌输而轻反应。在一些地方,反腐倡廉教育培训课程安排没有针对性,课时也不足,只是一种点缀和陪衬;干部接受培训,只是希望广交朋友、培养人脉,对于学员通讯录的兴趣远比教材要大。中央明确提出提高教育实效,就是对这种状况对症下药。”

叶笃初归纳道:“反腐倡廉各项制度都是作为过程而不断发展的,在实践中逐步深化、进步、完善。制度建设是科学性和实效性并重的任务,必须坚持科学指导,提高自觉性,克服盲目性,反对主观主义、形而上学。必须坚持管用、有效,对于制度建设掉以轻心、敷衍塞责,甚至不切实际地做表面文章,或者搞花架子、弄虚作假是绝对不允许的。”

监督是关键环节

监督被视为反腐倡廉的关键。加强监督制度的部署很明确:认真执行和不断完善各项监督制度,积极探索加强监督的有效途径和方式方法,加大监督制度创新力度,逐步完善监督体制,明确监督责任,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

其一,加大监督力度,突出监督重点,前移监督关口,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监督,加强对制度执行的监督,加强对重点人员、重点岗位、重要职能、重要事项的全方

位全过程监督，增强监督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其二，改革和完善党内监督体制，加强党的代表大会、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党代会代表的监督作用，健全和规范党委常委会向全委会定期报告工作并接受监督制度，充分发挥民主生活会、巡视工作作用，加强上级监督和领导班子内部监督，积极探索上级纪委支持和协助下级纪委加强对同级党委常委会成员进行有效监督的制度，健全纪检监察机关派驻机构对驻在部门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监督的制度。

其三，健全权力运行监控机制，推进权力运行程序化和公开透明，严格执行和不断完善领导干部述职述廉、诫勉谈话、函询、质询、罢免或撤换等制度，推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廉政承诺制、行政执法责任制。

其四，完善党内决策监督机制，落实重大决策报告制度，健全决策失误纠错改正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健全干部选拔任用监督机制和干部选拔任用责任追究制度，加强对干部选拔任用提名、考察、决定等环节的监督，充分发挥考核在干部管理工作中的监督作用。

其五，落实重要情况报告、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完善谈心谈话制度。

其六，建立健全党内民主监督机制，落实党员监督权，健全党内情况通报制度，完善民意调查制度，建立健全党内事务听证咨询、党员定期评议领导班子成员等制度。

同时，拓宽监督渠道，健全信访联席会议制度，坚持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专门机关监督与群众监督相结合，发挥好舆论监督作用，增强监督合力。

林喆解读说，没有公民权力监督这一外部监督的切入，反腐败的效果就会停留在对个别人腐败的处理上，腐败的温床依然存在。一次大案查处之后，也许只是腐败利益的转移，而不是腐败的彻底消除，这就是“前腐后继”何以屡屡发生的根源。完善权力监督体系，首先要走群众路线，给群众提供一个平台，用权利限制权力。

预防是治本之策

预防腐败制度建设的具体要求：首先是坚持权力配置科学、界限明确、行使依法、运行公开，

把预防腐败的要求落实到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各个环节。

其次是推进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从重点领域、重点部门、重点环节入手，排查廉政风险，健全内控机制，构筑制度防线，形成以积极防范为核心，以强化管理为手段的科学防控机制。

再者是建立健全预防腐败信息系统，逐步形成信息共享机制和腐败预警机制，及时准确判断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重点领域、重点部位、重点环节以及廉政风险，增强科学分析和预防腐败能力。

同时，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完善公共资源配置、公共资产交易、公共产品生产领域市场运行机制，加快研究制定相关法规制度，研究制定规范行业协会、市场中介组织等社会领域预防腐败制度，规范各类学会、协会、基金会准入制度，把预防腐败的要求拓展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和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行业组织、中介机构等各个方面，形成有效预防腐败的长效机制。

惩治决不放松

来自中央的信息强调，要坚决遏制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势头，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惩治这一手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

对一些领域腐败现象近些年仍然易发多发，并造成极坏的社会影响，高层的分析有两个因素令人震动：

一是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多元利益主体在我国市场上的竞争日趋激烈，不法分子通过商业贿赂攫取非法利益，拉拢腐蚀公职人员；

二是一些地方和单位管理失之于软、失之于宽，应该严厉惩处的没有严厉惩处，好人主义盛行，有的甚至包庇腐败和犯罪。

进一步加强惩治制度的要求是：认真研究和准确把握新形势下腐败案件发生的特点和规律，探讨分析案件查处中的难点问题尤其是制度缺陷，建立健全腐败案件及时揭露、发现、查处机制，更有效地查处腐败案件；

加强反腐败立法，修订完善惩治腐败的法律法规，坚持不懈进行法律法规教育，坚持依法惩治腐败、打击犯罪，减少违纪违法者利用制度漏洞对抗组织调查、掩盖事实真相、逃脱应受惩罚、获得非法利益的可能性；

建立腐败现象易发多发领域调查分析和专项治理制度，加强重点领域案件查处工作；

健全查处案件协调机制，完善到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公安、检察、审判、司法、审计等部门案件线索通报移送机制，健全纪检监察机关内部各职能部门案件线索协调管理机制；

建立重大案件督导督办机制，加强上级纪检监察机关对下级纪检监察机关办案工作的领导；

健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及其配套制度，对有事不查、办案不力甚至阻挠办案的领导班子、执纪执法机关和领导干部，要严肃追究责任；

建立健全依纪依法安全文明办案的纪律要求以及责任追究制度；

完善举报人和证人保护制度，探索建立举报人奖励制度，保护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参加反腐败斗争的积极性。

通过加强司法协助、引渡、追缴和返还腐败资产等方面国际合作，使腐败分子无处藏身。

林喆认为，当前追捕外逃贪官，引渡和返还腐败资产等是主要障碍之一。截至目前，虽然已经有数十个国家与我国签署了引渡协议，但是其中并没有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

林喆说，在未来的追堵外逃贪官工作中，我国要充分运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提供的平台和渠道，积极参与反腐败国际合作，努力在追缴和返还腐败资产等方面取得实质性合作成果；同时，应做好有关国内法与公约的衔接问题，理顺国家法律与其他反腐倡廉制度特别是相关党内规定的关系，把公约的普适性与我国的特殊性结合起来，认真履行相关国际义务。

“突出抓好四项制度建设是反腐倡廉建设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我们党推诚布信、以安民心的积极之举，更是保证我们国家长治久安、弭患消祸的根本大计。”叶笃初说。

（摘自《瞭望新闻周刊》2010年第3期 记者陈泽伟）

《预防腐败法》出台前夕：

广东一把手分权

就在《预防腐败法》还在紧张起草之时，汪洋主政下的广东出台了令人震撼的防腐新招。

相比于早前新疆阿勒泰曾推行的官员财产公示不同，广东出台的预防腐败措施直指“一把手”。

为防治一把手“一股独大”，不久前，广东出台了预防腐败的《实施意见》（下称《意见》），要求党政干部一把手不直接分管人事、财务等重要部门工作，另外《意见》还指出广东将逐步实行党政一把手家庭财产在一定范围内“公示”的制度。

“虽然来的晚一点，但广东有亮点。”一位看了《意见》的党风廉政建设研究者说。

另据记者获悉，中央已经督促有关方面尽快起草出台《预防腐败法》，目前有关研究廉政的学者已经开始着手起草工作。

有反腐专家认为，广东此举对预防腐败有积极意义。

防治一把手“一股独大”

2009年9月，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领导干部把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列入报告内容”。

之后，全国各地根据中央决定相继出台了相应的实施意见，在众多“大同小异”的意见中，出台相应意见较晚的广东决定实施党政干部“一把手家庭”财产公示，意见一亮相，便引起外界高度关注。

2010年1月6日广东省委十届六次全会透露：广东将逐步实行党政“一把手家庭”财产在一定范围内报告制度，并推出《实施意见》，该《意见》要求：

党政正职不直接分管人事、财务等重要部门工作；探索实行党风廉政建设第一人述责制度；对有群众实名举报的一把手必须及时核查。

“不难看出，此次广东方面，已经将财产申报由过去的个人收入、住房、投资等方面直接延伸到了‘家庭财产’，并要求在一定范围内公开，解决了申报人可以自由的把财产挂在其他家庭成员名下的问题。”我国著名反腐学者王明高分析说。

此前，王明高曾专门针对此前规定之局限性做过深刻分析。他说，过去界定的“收入申报”只是申报主体的“个人部分收入”，而非“全部收入”，更非“财产状况”，这几个词语在预防腐败中所代表的含义是非常显著的，因为后者反映了增量和总量。尤其是将家庭财产一并纳入进来考虑，才能真正反映官员的真实财产状况。

在王明高看来，此次广东从党政一把手入手，是让主要领导干部率先接受“阳光”的照耀。

此外，广东还特别限制一把手的权力，将人权、财权分流给副职官员，防止其权力“一股独大”。事实上，这种安排，是从中国反贪机构多年来查处各种大案、要案的经验中来。官方发现，大部分一把手“出事”，都是因为其权力过大，不受约束使然。

《检察日报》曾经把一把手职务犯罪的手段归结为六种：利用人事权收受贿赂、利用财务支配权直接侵吞公款、利用建筑工程决策权收受贿赂、利用形形色色的审批权受贿、利用政府采购或者商品购销决定权受贿、利用权力的影响力从中受贿。从中我们不难发现，一把手手中的人事权、财务权、决策权，正是一把手犯罪成功的重要条件。

王明高曾深入监狱，对湖南郴州特大窝案的几名要犯专门进行过谈话，郴州市原市委书记李大伦坦言，在郴州，他的权力不受任何监督；而原纪委书记曾锦春说，惟一能监督他的就是李大伦，但李大伦本身就有严重的贪腐问题，不可能监督到他。

江西原副省长胡长清曾用“牛栏关猫，进出自如”来形容他的权力如何自由，对他这样级别的

领导来说，所谓的党纪国法根本形同虚设。正如官场上的一句顺口溜所言：下级监督太弱，同级监督太软，上级监督太远。

去年以来，广东落马的几位要员，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由广东调任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华元、深圳市市长许宗衡等人，无不是位高权重的党政一把手。广东此次痛下决心对一把手过大的权力进行适当的削减，应为有的放矢。

网友质疑，学者谨慎乐观

这条富有爆炸力的新闻出来之后，引起了全国各大网站的广泛转载，但网友的留言，除了表示欢迎，愿意“听其言，观其行。”亦有不少留言认为，由于缺乏来自公众的监督，具体实行的效果将如何，不能太乐观。

对一把手把家庭财产在“一定范围内”报告，有网友质疑，这关键的几个字，或将导致这项措施的“美好愿景”大打折扣。“真正的‘阳光法案’，应当向全社会公示。”

此外，亦有网友认为，就算一把手不管人事、财务，但他的权力足以“影响”人权、财权的方向。

王明高则表示，“广东的想法非常好，探索精神值得肯定，但许多配套条件尚不成熟，尤其是我们尚未实行‘金融实名制’。只有实行‘金融实名制’之后，一切大额交易必须通过银行转账进行，贪官的贪腐行为才会暴露在阳光之下。”

“如果我们规定现金交易只能在1000元以下，那么10万元的现金就要取100次，这种不正常的取现极易被监管部门发现。”王明高说，“科学制度反腐就像一张网，如果这个网有一面是破的，那么实际上根本起不到防范的作用。”

王明高认为，中国要切实进行严厉有效的反腐败，必须尽快出台《预防腐败法》，从制度安排上严防腐败的条件产生，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本报得到可信消息，国家高层正督促相关部门尽快出台廉政反贪腐建设的基础性法律——《预防腐败法》，并已委派有关专家着手研究起草。

（摘自2010年1月18日《中国经营报》记者江海波）

腐败与反腐败的较量

——2009年腐败现象与反腐败行动的特点

林 喆

2006年以来，腐败现象在我国呈现出级别越来越高、涉案金额越来越大、群蛀现象日益严重的三大发展趋势。2009年仍在延续这种趋势，但也具有一些新的特点。

首先，腐败主体向基层渗透，从级别来看主要集中在科级干部层面上。由于这部分干部与基层民众直接接触，故其影响的恶劣程度比级别更高的干部更甚，基层民众对其腐败的感受也更为深切。

其次，与此相关，沿海地区干部队伍，特别是年轻干部中的腐败现象比内地突出。由于科级干部年龄较小，故而一时间“年轻干部成为腐败高发群体”的问题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这一现象除了表明沿海地区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应注意政治文明的建设，保持干部队伍的廉洁外，还说明建设年轻干部队伍和完善用人制度的重要性。

第三，由于执法行为的偏差，出现多起群体性突发事件。典型的有湖北的“1·7天门事件”和“6·17石首事件”。虽然两起事件最后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有关责任人受到了追究，但是它们的发生给我们的基层组织以极大的警示，即群众的事无小事，必须认真对待。

第四，一些领域的腐败行为和潜规则未绝，另一些领域（如高校）的腐败浮出水面。2009年曝光的胡士泰等4人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力拓门”，使人们看到企业反商业贿赂斗争的长期性。而曝出的

广东湛江师范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郭泽深在学校基建、财务等方面涉嫌经济问题，被宣布实施刑事拘留，武汉大学副校长受贿被拘，以及复旦大学同门师兄弟相互抄袭的学术丑闻更是令人震惊。这些年高校日趋行政化，使在行政领域内的腐败现象也在被视为“一片净土”的大学中出现。媒体列举的高校落马领导长的名录，加上不间断的剽窃之类的学术腐败丑闻，使高校廉政建设的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上。

第五，不正之风依然未绝。不正之风的表现形式形形色色。4月2日河南省召开“讲正气、树新风”主题教育活动动员大会，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光春在狠批奢靡之风时指出，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的不良风气有四种：一是贪大求洋、追求豪华、过度消费、不注意节俭的奢靡之风；二是急功近利、目光短浅、脱离实际、做表面文章的浮躁之风；三是贪图享受、贪图钱财、贪图美色的贪占之风；四是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的跑要之风。

第六，司法腐败依然严重。年中重庆打黑中暴露出的司法机关人员与黑恶势力的勾结状态令人吃惊。在这一行动中，截至10月28日共有2954名涉黑人员被缉拿归案，司法局原局长文强等10名厅局级官员（其中多为司法人员）落马。它清楚地展现出近些年来，在一些地区黑恶势力渗透到我们的一些部门中，腐蚀拉拢

党员干部，使之成为他们的保护伞的严重状态。

第七，官员八小时之外行为的监督仍然存在漏洞。2009年5月邓玉娇刺死官员案引人瞩目。该案显现出部分干部的无耻和堕落，后者在受到社会舆论一致唾弃的同时，也让社会看到对官员八小时以外行为的约束和监督问题。

2009年也是党和国家继续加大反腐败力度、人民与贪官继续较量的一年。从总体上看，2009年的反腐败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进一步加强了党员干部队伍的建设。1月10日至11日中纪委五届全会在京举行，强调切实解决党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特别是对有以下顶风违纪行为的领导干部必须严肃处理：一是对于“跑官要官”的，要批评教育，不能提拔重用，在重要岗位上的要予以调整，已得到提拔的要坚决撤下来；二是对“跑官要官”制止不力造成用人严重失察失误的，要严肃追究责任；三是对于放任、纵容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领导干部职权和职务影响经商办企业或从事中介活动谋取非法利益的，要辞去现任职务或者由组织责令辞职，并按照规定给予纪律处分；四是对利用婚丧嫁娶等事宜收钱敛财的、参加或到国（境）外赌博的要从严惩处。

之后，中共中央十七届四中全会将坚决反对腐败作为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重申要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并规定违反规定收送现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的，按照组织程序一律先免职，再依据规定处理。

其次，加大了反腐败立法的进程，2009年出台了多部法规和党内规定。其中比较重要的，一是最高法和最高检新增九个刑法罪名，尤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引人注目。刑法修正

案（七）将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或收受贿赂数额较大或有其他较重情节的行为，以及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及其他关系密切的人，利用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索贿受贿行为，规定为犯罪。

二是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该规定弥补了以往问责制度的缺陷，确定了问责原则，并规定了问责的情形、从重问责、从轻问责、问责程序和问责方式，以及适用、范围、程序，被问责者复出的原则、条件和程序；规定在七种情形下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还首次将用人制度上的问题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方面出现的问题（也即监督问题）列入问责范围。

三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该规定明确指出，国企领导人员违反本规定受到降职处理的，两年内不得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或者高于其原任职务的职务，构成犯罪被判处刑罚的，则终身不得担任国有企业的领导职务。未经批准，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不得决定本级领导人员的薪酬和住房补贴等福利待遇，不得让本人的配偶、子女及其他特定关系人，在本企业的关联企业、与本企业有业务关系的企业投资入股，也不得利用职权为配偶、子女及其他特定关系人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提供便利条件；并要求国企领导人员依据有关规定进行职务消费，如不得将履行工作职责以外的费用列入职务消费。该规定明确禁止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用公款旅游或变相旅游，以及在企业发生非政策性亏损或者拖欠职工工资期间，购买或者更换小汽车、公务包

机、装修办公室、添置高档办公设备等。它还对国企领导勤俭节约等问题作出了规定。这一办法对遏制企业腐败具有重要意义。

四是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该条例对于巡视工作的性质、职责、范围、任务、原则、人员管理、监督对象、汇报程序、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职责,回避、工作方式,请示报告制度,巡视工作人员所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学习培训、表彰奖励,纪律和责任,以及违纪后的处分等作出了明确规定。这个条例的颁布实施对于完善巡视制度,规范巡视工作,坚持党管干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五是中央纪委颁布的《设立“小金库”和使用“小金库”款项违纪行为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它对设立“小金库”和使用“小金库”款项违纪行为的处理依据作了明确规定,界定了“小金库”的涵义;明确了设立“小金库”和使用“小金库”款项吃喝玩乐、挥霍浪费,新建、改建、扩建、装修办公楼或者培训中心,滥发奖金福利,报销应由个人负担的费用,私分国有资产等行为的处分依据;并区分不同情况界定了从重处分,免于、减轻或者从轻处分的相关政策界限;还针对顶风违纪行为,规定对有关责任人员,按照组织程序先予免职,再依据《解释》追究纪律责任。

中纪委、监察部、财政部、审计署联合印发了《关于在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开展“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的实施办法》,明确了2009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小金库”专项治理范围是全国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此次治理工作将持续至年底基本结束。

第三,继续纠正不正之风。2009年,从中

央到地方在制止公款出国旅游、滥建楼堂馆所、公款吃喝行为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月5日,中央纪委、监察部召开了全国制止公款出国(境)旅游专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会议提出进行制止公款出国(境)旅游专项工作,并将2009年作为因公出国(境)各项规章制度的执行年,特别是要按照有关规定的要求,对因公出国(境)经费实行先行审核,从经费上严格约束。要加大对顶风违纪行为的惩处力度。重点查处虚报出国(境)任务,通过购买邀请函骗取批准,擅自延长国(境)外停留时间,擅自增加出访国家和地区等案件。

第四,司法部门加大廉政建设的力度。年初最高法院下发了五项禁令,即“严禁接受案件当事人及相关人员的请客送礼,严禁违反规定与律师进行不正当交往,严禁插手过问他人办理的案件,严禁在委托评估、拍卖等活动中徇私舞弊,严禁泄露审判工作秘密。”4月30日,全国人民法院队伍建设工作会议提出,从下半年开始,用一年左右的时间,集中开展以“人民法官为人民”为主题的中级法院、基层法院院长轮训工作,将增强司法能力的培养贯穿于培训工作的全过程和各个方面。随后,一些地方高院以聘请专家或举办法官论坛的形式加强了法官队伍的建设。

第五,各地党组织和政府加强廉政建设,在官员财产申报、公车使用等方面大胆进行改革,推出各种限制性举措。如新疆阿勒泰、湖南浏阳和湘乡、上海、重庆等地推出了含公示或一定程度公示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2009年的腐败与反腐败经历了非常激烈的较量。正如十七届四中全会所强调的,反腐败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和艰巨的,今后的较量仍将十分激烈。对此,我们应有充分的认识。

(摘自2009年12月28日《中国青年报》)

中央布局弥补经济五大“短板”

方竹兰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在继续保持中国经济稳步发展的同时，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在发展中求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这一战略思路深入揭示了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特征和未来目标，将引领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短板一：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全球经济危机导致引进模仿型经济的出口受到严重抑制，迫使我们调整产业结构，进行自主创新；同时全球经济危机也为我们提供了赶超美国的时间。关键在于加速改革阻碍自主创新的原有体制机制，如果体制机制改革迟缓，就有可能使我们不能充分利用这次时间差培育原始型创新能力，如果等美国人从经济危机中复苏，我们与美国还是处在不同生产发展等级，就会遗憾失去一次极好的历史机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把推动自主创新与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结合起来，努力实现创新发展，就是要抓住这次历史机遇，培育中国的国际竞争力。

短板二：内需不足。在国家外汇储备以及财政信贷资金与人民群众的消费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体制机制障碍。相对充足的资金和外汇还没有找到通畅的渠道和有效的模式转化为民众的消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把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与稳定外需结

合起来，着力增强经济发展的均衡性，用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增强社会保障和政策补贴等措施扩展民众的消费空间。为切实解决贫富差距过大，内需拉动经济乏力奠定了政策基础。

短板三：促进民间投资的制度不到位。我国民间投资既缺乏平等竞争的进入环境，又缺乏财政金融的及时而充分的支持，抑制了社会民众的创新创业热情，也加大了解决就业问题的难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合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提出了两个方面解决路径。一方面是尽可能放开竞争渠道，另一方面是加大金融体制的支持力度。

短板四：金融体制改革的两难困境。中国金融体系与美国金融体系的角色不一样。美国金融体系的竞争程度比较高，风险投资和资本市场成熟，金融衍生品发达，对经济的影响是双刃剑。而中国的金融体系的竞争程度还不够高，风险投资和资本市场还处在发育阶段，面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金融体系面临两难选择：一方面需要提高金融竞争度和开放度，另一方面又要遏制过度的金融投机，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要求给与金融体系一个准确的定位。为此，目前中国的金融创新及金融改革需要根据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把握分寸，发展前景不能只是国际大金

融机构的已有做法，而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和需要，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强化人民群众对于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创新的知情权、决策权和监督权尤其重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对经济服务功能。要加强金融监管机制建设，改善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和服务，继续推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从而为金融体制改革指明方向。

短板五：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职能转型。中国正处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还需要加快体制转轨的速度。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角色错综复杂。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进一步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要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深化资源价格和财税体制改革，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扎实推进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可以相信，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必将促进政府体制改革的深化，加快服务型政府的建设速度。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需要以制度创新做保障，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突出了以体制改革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在每一个关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问题的解决对策中都突出了深化体制改革，尤其提出以完善绩效考核评价机制为抓手，增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不断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体现党在执政方式上的自我改革决心。

（摘自《人民论坛》2009年12月（下））

经济“调结构” 要过“五道坎”

消费不足、产能过剩、减排压力——尽管2009年我国经济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实现“保增长”目标已无悬念，但仍然面临一系列深层次发展矛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将是明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在这场“调结构”攻坚战中，要如何跨过转变发展方式的门槛？

传统产业：从“去库存”到“去产能”

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随着经济形势总体回升向好，我国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传统产业，实现了产销基本平衡。最新数据显示，1月份至10月份，重点钢铁企业的钢材产销率为98.2%；水泥产销率为97.8%。

但“去库存”只是传统产业走向复苏的第一步，这些行业中存在的重复建设、产能过剩以及结构不合理等深层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一些传统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步伐放慢，新增投资较多，很可能旧病未除，又积聚了新矛盾。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说，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如果我们仍停留在原有经济结构上“保增长”，就会错过这次“深度调整”的战略机遇，在下一轮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为抑制产能过剩，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正进一步加强对传统制造业的审批管理，提高产业准入门槛。这些举措能否有效解决传统产业的“去产能”难题，人们充满期待。

新兴经济：抢占“后危机时代”竞争制高点

近年来，物联网、3G手机、低碳经济等新概

念应运而生。在相关政策扶持下,各地将培育和发展新能源、新材料、信息网络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调结构”的重大举措,取得明显成效。

但由于一些地区不顾条件盲目竞争、一哄而上,也产生了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问题。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时丽教授表示,国内一些新能源项目除了规模扩张过快,就是普遍缺乏自主技术。

在一些地方,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也陷入“混战”。山东时风公司开发了一款最高时速50公里的小型低速纯电动轿车,当地政府默许购买人不用考驾照就能上路行驶,最终沦为备受诟病的“山寨车”,只出了5000台就被迫停产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冯飞认为,当前全球经济格局正在重构,各国都在积极抢占经济发展制高点。但如果新兴产业“一窝蜂”上马,不仅对资源造成浪费,也不利于整个产业的有序发展。

消费驱动:从“消费挖潜”到“收入增长”

“调结构”除了调整产业结构,需求结构的调整同样重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但目前我国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依然不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研究员张立群说。目前的消费刺激政策主要还是着眼于“消费挖潜”,要从根本上扩大内需,除了优惠政策及商业布点之外,促进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仍是根本。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表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加快城镇化建设,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这是持续扩内需、保增长的根基。当务之急是着力提高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提高种粮农民和低收入群体的补贴水平,改变“收入跑不赢GDP”的局面,让百姓有钱花、敢花钱。

节能减排:资源要素“价改”难题待解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在经济结构调整中要推进节能减排,强化目标责任制,加强节能减排重点工程建设,加强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解振华表示,到2009年上半年,我国已经完成了单位GDP能耗比2005年降低13%的任务,尽管困难很大,但是经过努力,2010年减排20%的“十一五”目标有望实现。

按照经济发展规律,节能减排越往后越难。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前夕,中国政府决定,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40%至45%。下一步我国节能减排将步入更加艰难的“攻坚期”。

在这一过程中,推进水、电等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至关重要。适度提高资源要素价格,有利于发挥价格在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抑制“两高”行业盲目扩张的杠杆作用。而在“管理通胀预期”与“调结构”之间,也将充分考验政府的调控艺术。

地方政府:防止“调结构”流于形式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在国家“一揽子计划”落实中,一些地方出现了重经济增长、轻结构调整倾向。为了“把钱花出去”,放松环保、能耗等“市场准入”监管,使“调结构”在“保增长”大旗下流于形式。

一位县委书记说:“对县市领导来说,百姓要就业,干部要工资,必须首先抓好两件事,一是招商引资,二是财政增收。我的篮子里本来没有菜,挖到篮子里就是菜,搞结构调整那还不是我们的优先选项。”

“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问题,与一些地方政府盲目追求GDP扩张密不可分。”左小蕾说,“陷入招商引资竞赛的地方政府,即使遇到重复建设,往往也会因为保就业、保GDP等因素,与企业结成事实上的联盟。最终的结果是:产能上去容易下来难。”

有关专家认为,要减轻“调结构”的阻力,必须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扫除体制机制上障碍。比如,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使之更有利于地方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在干部考核评价指标体系上,要切实改变单纯以经济增长等“显绩”指标衡量政绩的观念与做法,更加注重发展方式转变等“潜绩”考核。

(摘自2009年12月21日《新华网》新华社记者宋振远等)

三角形：中国经济的理想模式

唐双宁

自然科学中的“三角形稳定性”原理其实是一个普遍性原理，在社会科学领域同样适用。要保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同样需要选择三角形的发展模式。

这个三角形的第一只角是速度。我国应把8%—9%作为经济增长的中长期目标。从历史的经验看，我国经济增长既不能太慢，也不能过快，更要防止大起大落。大起之后必有大落，这是事物发展的辩证法。理想状态应当是“缓起缓落”。未来10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不能低于8%，但也不宜高于9%，否则将带来结构问题、后劲问题、就业问题、未来危机问题等一系列问题。实现8%—9%的增长速度并不是平均分布，后发地区可以快一点，先发地区应当慢一点。国家在主要依靠市场调节的同时，应当辅以政策调节的办法实现这一目标。

第二只角是结构。要保持三角形的稳定性，必须大力调整经济结构，解决长期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问题。概括地讲，主要是调整好8个结构：一是调整发展结构，逐步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二是调整增长结构，逐步实现出口、消费、投资的协调增长；三是调整城乡结构，逐步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四是调整地区结构，逐步实现东、中、西部的协调发展；五是调整产业结构，逐步实现一、二、三产业的协调发展；六是调整企业组织结构，逐步实现大中小型企业、各类所有制企业的均衡发展；七是调整产品结构，生产社会急需的各类适销对路产品；八是把握发展动态节奏，即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哪些生产、哪些研发，哪些开采、哪些储藏，规划好当前和长远的协

调发展。

为了使上述8个方面的调整逐步到位，当前投资应当向6个方面进行重点倾斜：一是继续投向适度比例的基础设施，特别是农村公路交通、农田水利、文教卫生、防灾减灾等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加快小城镇建设；三是继续补民生之课，特别是大补快补环境保护、国民教育、文体旅游、医疗卫生及重大基础配套设施等领域；四是加大科技投入，特别是海洋、极地、外空、国防、生物医学、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等国家创新战略前沿方面的研发投入；五是有战略意义的能源、原材料与海外投资；六是重点地区重点领域的生态建设投入，如防沙治沙、植被建设、江湖治理等等。

第三只角是安全。重点有四：一是通货膨胀问题；二是不良贷款问题；三是财政赤字问题；四是过高的外汇储备问题。我想重点说说不良贷款问题。为抗击金融危机，配合国家的经济刺激计划，去年全国银行贷款新增约10万亿元，且极不均衡。我们应当认识到，银行信贷同宏观经济紧密相连，具有典型的“潮水效应”。许多放款时认为很好的项目，由于宏观形势的变化，会成为不良贷款。当然，由于宏观形势的好转，有时不好的项目也会变为好的项目。上世纪90年代初，一年多时间的经济过热，带来的是10年的不良贷款艰难处置。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的教训我们应当认真汲取。

最后的结论是，中国经济只有在速度、结构、安全上构成三角形关系，才能稳定，才能在稳定中发展。

（摘自2010年1月1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七策发力“三农”薄弱点

赵 涛

在刚刚结束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中央领导指出，2009年面对多年不遇自然灾害的重大考验，以及国内外农产品市场异常波动的不利影响，“三农”工作迎难而上，巩固和发展了农业农村好形势，为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回升向好提供了基础支撑。

但是，在应对仍在持续的金融危机的关键时刻，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依然面临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

五大薄弱环节待解

农业生产效率较低。由于当前农村生产主要是大量家庭分散经营，农业生产效率低下，个体小农经济抵御市场风险和自然灾害的能力明显不足。随着目前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家庭分散经营在生产组织形式上受到市场经济发展的挑战，个体小农经济在资源、信息各方面与农产品市场供求及价格波动严重不对称，导致农业生产比较效益出现下降趋势。在这种形势下，部分农产品生产下滑、农业生产滑坡、农产品价格过度波动等问题随时可能发生。农产品进口和农产品国际市场价格波动也会冲击农业生产。

农产品卖难未得到有效解决。从世界经济发展史看，随着农业科技包括良种、化肥、农机和其他农业科技的发展和应用，农业劳动生产率在达到一定水平后，农产品过剩成为农业生产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这在包括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的农业发展过程中均出现过，近些年来我国多种农产品卖难问题正是反映了这种经济规律在起作用。我国农业在90年代解决了吃饭问题后，在新世纪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农产品过剩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势必发生“谷贱伤农”。这一问题将直接影响

农民增产不增收，浪费农业资源。因此，发展现代农业除了要确保农产品供应外，要加大对农业资源调控的科学性，重视解决农产品卖难问题。

农村土地利用率低成为农业生产发展中的大问题。目前跨省流动的农民工约1.5亿人，大部分是从中西部流出，集中在京津塘、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特别是中西部产粮大省如安徽、湖南、河南、四川等大批农民工长期举家外迁，房子、土地长期闲置在农村，导致出现空心村多、空闲地多、撂荒地多的现象，如在安徽部分县空心村比例超过30%，致使农村土地利用率低。与此同时，城市土地不足以承载城市化过程中城市扩张的需要，有些工厂因土地限制，甚至缩短生产线，限制生产能力。

农民工如何“市民化”。大批进城农民工在有了稳定工作后，往往举家迁入城市，这些农业人口的大部分希望继续留在当地打工，不愿意再回家乡务农。他们对经济发展、城市服务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但农民工在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购以及社会保障方面与城镇居民差距大，待遇不公平。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跟不上大批农民工进城及流动的需要，如由于大部分农民工社保关系无法异地转续，农民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比例低至不足20%。在大批农民工成为产业大军的情况下，农民工社保关系异地转续层次亟待提高。

农村金融最脆弱。目前农民贷款难问题仍未解决，农村金融仍然是我国金融体系中最为薄弱的环节。农村金融业务和规模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相比，供需不平衡十分明显。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资金支持渠道亟待从主要依靠财政直接补贴的方式向主要依靠农村

农业金融贷款和金融服务转变。

强基础七策扶农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要求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强化对“三农”的支持，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着力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中继续加强农业基础，在统筹城乡发展中继续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继续增进农民福祉。为此，可以从以下七个方面着力改善：

继续深化农村综合改革，完善农村经营制度，引导家庭经营向生产集约化方向发展。遵循和发扬合作社“自助、民主、平等、公平、团结”的核心价值观，和社员拥有所有权、控制权和收益权的基本原则，实现利益相关者合理的利益划分。鼓励农户采用现代科技和物质装备，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特别是，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引导家庭经营向生产集约化方向发展，通过多种形式发挥“统”的优势，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水平，提高农民参与市场的竞争力，增强农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提高并保证农民收入的稳步增长。

积极推进农业机械化发展。经过几十年的努力，2008年我国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提高到45.8%，其中，机耕水平达到63%，小麦生产机械化水平超过81%。2009年全国农机专业合作社总数达到1.3万个，新增近5000个。农业机械的应用，促进了生产规模化、集约化和产业化，提高了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既减轻了农民的劳动强度，改善了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又提高了农产品产量、质量和效益，并使我国农业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大力推进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创新，全面提高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农产品供给。大规模开展农田基本建设，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快建成一批高产稳产基本农田，着力提高耕地的持续增产能力，扩大节水灌溉面积。把农业科技创新的重点放在良种培育上，组织实施好转基因生

物新品种培育等重大科技专项。实施全国新增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大规模开展粮棉油高产创建活动，大规模开展园艺产品生产和畜牧水产养殖标准化创建活动，大力推动菜篮子产品集约化、设施化、规模化、标准化生产。确保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

坚持节约用地制度，努力提高农村土地利用效率，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从长远看，要打破城乡规划的二元分割，统一编制城乡建设规划，促进城乡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要建立健全耕地保护补偿机制，不能损害农民的土地权益。通过“农民集中居住、工业集中发展、土地适度集中规模经营”，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减少土地资源浪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要适应农业组织化和机械化发展，不得搞强迫命令，不得随意改变土地用途。

加大强农惠农政策力度。国家财政支出、国债资金、土地出让收入等要向农业农村倾斜，引导信贷资金更多投向农业农村。新增种粮补贴要更多向有利于促进使用先进生产技术和优化品种、提高质量的方向集中，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和农村公共服务能力建设，改进教育培训、医疗卫生、公共文化服务，强化乡村正常运转的财力保障。

千方百计促进农民多渠道就业。加快农民工融入城镇的步伐。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农民工在城镇的就业和生活问题，逐步实现农民工在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购以及社会保障方面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使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

大力发展农村金融。要加大培育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对涉农金融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包括农村金融贷款担保、银行贷款贴息、农业保险补贴、降低涉农金融机构法定存款准备金比例、减征涉农金融机构营业税等多重政策措施支持农业金融业务快速发展，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和我国农业现代化对金融业务的需求。

（摘自《瞭望新闻周刊》2010年第1期）

让更多符合条件的 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市民

王克忠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这是一项加快城镇化，提高城镇发展质量和水平，扩大内需，扩大消费的重大战略性举措。

在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包含两大类：一类是就地转移，转入本村的非农产业，即乡镇企业，称“进厂，不进城”。这种转移严格说还没有进入城镇化的“过程”。另一类是异地转移，即转入镇、县城、地级市、省城或跨省进入别的大中小城市。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对全国的抽样调查研究后指出，1997—2000年全国稳定转移出去的农村劳动力数量逐年增长，从1997年的8314.5万人增长到2000年的1.13亿人，其中进入各类城市的比重由1997年的31.81%上升为2000年的41.27%。另据人口普查数据：2007年我国城镇人口5.9亿，城镇化水平45%，其中包含了1.6亿农村转移人口。过去一些地方政府虽然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名称，甚至让一些农民工登记为城镇常住人口，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户籍上的不平等制度，从而未能享受当地户籍人口，即城镇居民享受的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待遇。他们成了城市边缘群体，长期处于流动状态，“候鸟式”地常年徘徊于城乡之间，这种不稳定的生活把

他们的消费压到了极低的水平。严格说，这些农民工已进入城镇化“过程”，完成了职业转移，基本上属于城镇人口但未完成居住地的空间转移，也就是说他们暂时未摆脱农民身份，转化为真正的城市市民。所以，可称为“半城市化”现象。

这些农民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已经较长时间（5年以上）或多年在城镇稳定工作，许多人成了产业工人、建筑工人或第三产业单位的职工，是我国工人阶级队伍的中坚力量；二是有了较为稳定的收入；三是有较固定的住处，一般居住在单位的职工宿舍、工棚或租住于近郊的农民住宅。从上述特点看，这些农民工的经济来源和生活方式与农村已没有直接的联系，他们的思维方式也更多地接近于城镇居民，所以，可以说他们是完全属于“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只要加以引导，只要创造相应的条件，就可以让这些农民工转化为城镇人口。这种“半城市化”现象，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十分不利。首先，它严重影响了中国城镇化的进程，特别是城镇化质量和水平的提高；其次，它严重影响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特别是第三产业难以正常发展；再次，它严重影响了内需特别是消费的扩大，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和留守农村的几亿人（配偶、父母、儿女）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难以提高；最后，它也严

重影响了我国农业的现代化和农业的规模化经营。

现在该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怎样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就业和落户呢？一要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让已经多年在城镇打工的农民工转化为城镇居民，并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二要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居住条件包括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以吸纳农民工及其配偶、儿女等亲人进入城镇居住、生活和就业；三要创新农村土地制度，进城镇的农民可以将自己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出租、互换或者以其他方式有偿流转出去，获得一定的收益，宅基地使用权也可以转让给符合条件的本集体成员，获得一定的收益，降低迁移成本，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保留，以解决农民后顾之忧；四要提高城市认同感，原有城镇居民应以欢迎、宽容、平等的态度对待农民工，消除在就业、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歧视心态。这样一亿多人转为真正的市民，并带动农村的配偶、儿女等亲人迁入城镇，享有城镇居民同等待遇，将大大加快我国城镇化速度，提高城镇化质量，从而对树立内需主导型战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

第一，这样做将大大扩大内需和扩大消费需求。如果一亿多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在城镇落户，转为真正的市民，就可能带动留守在农村的配偶、儿女等亲人一块迁入城镇，这样就有一二亿甚至更多的人口迁入城市。这里不仅进城的人口多了，而且还要看到迁入城镇的不再是单个的农民工而是一个完整的“家”。作为一个完整的“家”，其消费水平要高于单个农民工好几倍，其质量也将大大提高。如仅新增的2—3

亿人口的衣、食、住、行、教育、医疗、休闲等消费需求就是一个十分巨大的市场。

第二，这样做将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提高城镇发展的质量和水平。一亿多农民工及其配偶、儿女等家属进城，要求加快城市基础设施，水、电、煤气和医疗、教育、体育等公共设施建设。这不仅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而且将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就业的增加，又会提高收入水平，从而进一步提高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

第三，这样做将加快城镇第三产业发展。城镇化的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是第三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只有工业集中，人口集中，服务业才会发展起来。随着更多农民工及其配偶、儿女等家属转化为真正的市民，将会加快第三产业的大发展。新增几亿城镇人口本身就需要许多第三产业的行业，诸如以教育、医疗、体育、社保、就业等方面主要内容的公共服务业、以商贸、餐饮、旅游等为主要内容的消费型服务业和以金融、保险、物流等为主要内容的生产型服务业为其服务。第三产业的发展又为迁入城镇的农民工及其家属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进而又会增加收入，收入增加又会进一步扩大消费。

第四，这样做将大大加快农业的现代化和农业的规模化经营。随着更多的农民迁入城镇，他们的承包地可以转让给种田大户或合作组织，从而加快农业的现代化和扩大经营规模，也只有这样才能迅速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的收入水平。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又将为扩大内需，扩大消费创造条件。这样中国经济将进入依靠内需，依靠消费为主导的良性发展状态。

（摘自2010年1月7日《中华工商时报》）

城镇化 应配套土地制度改革

郑风田

仅有中小城市及城镇的户籍制度改革是不够的，还必须有配套的土地制度改革，实现农村城市土地“同地、同权、同利”，才能真正带动中小城市及城镇的发展。

目前我国实行城乡隔离两套土地管理制度，人为地把农村土地排斥在城市化之外。如果农村的土地要城市化，必须通过征地手续。

而每年国家为了确保土地红线，每个地区都分配相应的征地指标，这个指标对约束滥占农民土地的行为有效，但同时也基本废除了农民手中土地的武功，使农民手中的土地基本上除了种地别无他途。农民宅基地不能抵押贷款，承包地更不能进行抵押，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建房子属于小商品房，不能流通。

目前城乡同地不同权，大大限制了农村资源的价格，使农民一直没有可交易或者抵押的东西。如果通过“同地、同权、同利”，在基本农田范围之外，允许农民经营自己的土地，并且让农民获得经营土地的收益，小城市与农村的发展也都有希望了。

目前宅基地换房只给农民提供住房及有限社保，其实农民有没有工作以及进入城市后的培训或者创业资本更重要。应建立类似的土地交易机制，使农民宅基地与承包地真实地反映出其应有的价格，目前缺乏类似的交易机制，大多数农民的宅基地与承包地被变相低价出售了。

如果土地制度不变，与土地相关的制度不改，仅仅是把农民的户籍制度变成中小城市与城镇的户籍了，基本上不会有太大作用。

农民如果搬到城镇居住，即使采取目前浙江嘉兴的“两分两换”（宅基地换城镇住房、承包地换社保），农民并没有从置换中获得足够的资本。

当然如果有一个可交易的市场，农民通过卖出宅基地与承包地，除了获得城市户籍、住房与社保外，还能够有一笔资金从事小买卖，就比较可行。

实际上我国台湾过去的改革就是通过这条途径，失去土地与住房的农民，如果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以及一定的创业资本，在城镇是无法生存，大量集聚将会带来严重社会问题。

尤其是目前存在“农民上楼致贫”的现象。农民来到城市，住进楼房后，居住成本与原来在农村相比会大大增加，如果没有稳定工作，还要交物业费、水电费等，其生活质量就下降了。

所以目前靠政府大力推动的农民城镇化，如浙江嘉兴推动的盯着农民宅基地与承包地为主要形式的小城镇发展思路，一旦出现经济波动，大批中小城镇的新居民如果失去工作，被迫回返原来村庄却回不去，因为没有宅基地与承包地，这就会变得很危险。

仅给农民住房与社保是不够的，必须要解决他们的创业资本或者就业问题，才能稳定。

目前我国各地已进行了花样翻新的农民城镇化创新，做法都很类似，就是在一个城镇，宣传户籍制度登记不再分农村与城市户口登记了，都按居民来统一登记。

在中小城市，户籍制度背后的社会福利非常少，也非常容易做。只是大部分的地方政府，其发展的原动力基本上都是来源于工业发展的用地压力，也就是通过“土地占补平衡”。

通过让农民在中小城市及城镇落户，他们的宅基地与承包地就顺带以很便宜的价格给买断，他们今后的生活风险就比较大，如何防范类似的风险，需引起决策层的关注。

（摘自2009年12月24日《中国改革报》）

中国住房政策的症结何在

郑永年

很多年里，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不仅已经成了中国民众、政府和发展商的永恒话题，而且也是国际投资者和投机者的深切关注对象。房地产市场存在的巨大泡沫，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最大隐忧；而感到愤怒的是民众，因为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被变相地剥夺了“住房”权。

房地产泡沫不是新鲜事，在很多年里，泡沫一直在不停地上升。根据对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大城市的调查，大城市的房屋空置率已经远远超过 10% 的国际警戒线。在不少地区，这一比例甚至已经达到 50% 以上。同时，房地产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也不容置疑。房地产已经占了 GDP 的 6%，1/4 的投资在房地产行业，几十个产业与房地产关系密切。

房地产绑架中国经济

正因为如此，有关当局有足够的理由担忧房地产。前面有日本的例子。上世纪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房地产泡沫解体之后，日本经济在此后的 20 多年里没有走出阴影。海内外早就有很多人在讨论中国是否会步日本模式后尘的问题。现在又有迪拜事件。房地产无疑已经成了中国经济的金箍咒，如果房地产解体也很可能就是中国经济的解体。因此，有关当局一直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多年来，尽管有关当局也对房地产市场多有不满，但一旦当房地产遇到危机时，必出手相救。这次金融危机之后，

政府出台的庞大应付危机的资金，也有很大一部分流向房地产。毫不夸张地说，房地产已经绑架了中国经济。

与泡沫和空置房平行存在的现实是，中国 85% 的家庭无力购房（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最新调查）。这种情况使得中国社会对房地产业现状，以及对政府不能改变这种局面的不满，已经到达了一个新的沸点。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国房地产这种荒谬的局面呢？很多人往深一步，转向了土地供应市场，指向政府的责任。长期以来，政府行政限制土地的供应量，政府也搞寡头式垄断。同时，政府推行的“招拍挂”制度也阻碍着竞争性土地供应市场的形成。

很显然，各级政府的卖地财政提高了土地价格；为了消化高价土地开发商就抬高房价。这似乎很合乎经济逻辑。多少年来，人们所听到的似乎也只有经济学家的声音，那就是供求关系。但供求关系已经很难解释今天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的现状了。很简单，如果求大于供，就不会有那么大量的空置房了；如果供大于求，就不会有那么多人买不起房了。那么，在供求关系之外，还出了什么问题呢？

房地产主导思想失误

房地产市场现状的形成当然有很多原因。但依笔者看，最大的因素莫过于发展房地产市

场的主导思想的严重失误。简单地说，在中国，房地产被视为仅仅是经济政策的一部分，而非社会政策的一部分。因为商品房兼具投资和消费价值，人们对其价格上涨有预期。开发商利用这样的预期去囤积土地和新房，购房者也会迫不及待地去卖房，从而一步一步地把房价逼向新高。要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就要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但在中国，没有起到正面的作用，使得人们对房产价格上升的预期牢不可破。地方政府忽视住房的社会功能，而只强调住房的财政功能，即“土地财政”。土地转让金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30%以上，许多地区60%到70%的基础设施投资依赖土地财政。除了一般商品房的大幅涨价之外，住房的社会功能的缺位，更体现在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供给的极度缺乏。

纵观世界各国，凡是房地产市场发展健全和公共住房解决得好的国家，都是把房地产作为国家社会政策的一部分。这些国家并不把房地产看成是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一个重要资源，就是说，房地产对GDP的贡献不是这些国家政府的首要考量，首要的考量是社会成员的发展，是社会成员的居住权。经济因素当然很重要，但是这种经济考量是在宏观的社会政策构架内进行的。

房地产成为资本“游戏物”

新加坡是亚洲房地产市场发展得最健康的国家。新加坡学习了欧洲公共住房的经验，又结合自己的国情，创造了独一无二的公共住房制度。在新加坡，80%以上的家庭住在公共住房。公共住房投资是新加坡社会性投资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

反观中国，房地产从一开始就被认定为经济增长的一个最主要的来源。或者说，房地产是各级政府GDP主义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在GDP主义的指导下，房地产成为生产（建设）性投资，而非社会性投资，从而剥夺了房地产的公共性。房地产本来就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产品，因为其直接关切到社会成员的空间居住权，同时，房地产也直接关乎社会稳定与和谐。但在GDP主义构架内，房地产的唯一考量是利润，而非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

GDP主义盛行，有关方面就很难推出有效的房地产发展政策。这些年来，面对社会的不满，尽管也有一些政策出台，例如“廉租房”和“廉价房”，但远不能解决问题。

正因为房地产的目标是“钱”而非社会大多数成员的需要，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呈现出过度的开放性和投机性。在剥夺了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居住权的同时，中国各地的房地产不仅向国内的“炒房团”开放，而且更向国际资本开放。很大程度上说，中国房地产已经成了国内外资本的“游戏物”。

从技术上说，要遏制炒房和投机并不难，例如可限制购房的数量、规定住房居住的最低年限、收取房产税（即是在宣称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美国也是征收房产及其房产继承税的）等等。问题在于，所有这些可以非常有效的举措并不符合开发商、投机者和地方政府的共同利益，没有人会使用这些技术手段来限制房地产。进而，房地产也制约着中国经济和政府，有关部门也没有动力真正去采取行之有效的方法。

（作者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摘自2009年12月23日《参考消息》）

找准房价飙升根源对症下药

易宪容

要真正的遏制国内一些城市的高房价，最为关键的是认清许多城市房价快速飙升的原因是什么？找到房价快速上涨根源所在，才能够对症下药。

可以说，2009年国内房地产市场价格飙升，主要是从4月份开始。是房地产市场由消费为主导的市场转向以投资为主导的市场。当房地产市场是一个完全以投资为主导的市场，投资者以低成本的贷款过高的杠杆率进入，再加上早几年房地产市场赚钱效应（即只要购买了住房就赚大钱），城市的房价岂能不推高？

2008年1至9月份个人消费贷款达到1.2万亿，估计全年可达1.8万亿，是房地产泡沫较大的2007年同类贷款两倍半以上。而这些个人按揭贷款是什么人持有和多少人持有，这是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问题。2008年美国房地产泡沫破灭导致全球性金融海啸，但是美国95%以上的居民只有一套住房。而在中国，估计只有10%以下的人口持有这些个人按揭贷款，并持有住房多套。因此，当前的问题并非只是不少城市房价过高，而是这样一种房地产市场能够持续多久。如果房地产市场真的有泡沫并破灭，对整体有多大冲击的问题。

在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弄明白。一是中国房地产市场有没有泡沫或中国城市房价是部分高还是整体高？二是中国房地产泡沫是全国

性还是局部性的？三是房地产市场价格是不是可能只涨不跌？

首先，不少人会利用中国各城市房价的差异性及个人收入的差异性来证明中国房地产市场没有泡沫。但是，这些证明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经验上来说都是不成立的。因为，房地产是不动产，有多少城市就有多少房地产市场及房地产价格。由于中国经济发展严重区域性差异及城乡差异，各个城市的房价高低不同也是必然，因此，我们绝不可用一些房价低的城市的价格来证明中国没有房地产泡沫。因为，这些城市的房价不仅在整个国内市场中没有主导性、示范性，而且其销售的规模和比重也是比较小的。中国沿海一线城市房地产泡沫不仅可能用理论指标（如房价收入比、房价租金比、个人按揭贷款月还款比重、国际其他城市实际房价比较）证明，也可用每一个城市居民基本常识来证明。可以说，北京、上海、深圳等沿海房地产泡沫巨大已是不争的事实。

其次，从世界的历史经验来看，除了少数国家或地区之外，各个国家的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永远只是局部性的、区域性的，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其房地产泡沫会同时破灭。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往往都会从泡沫吹得最大、房地产市场最为脆弱的地方开始。既然房地产泡沫只能是区域性的、局部性的，那么当

上海、北京、深圳等地房地产泡沫吹得很大时，全国房地产泡沫也就不小。房地产泡沫大，房价岂有不高者？只不过是相对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而已。

第三，房地产市场价格是不是永远只涨不跌？从当前国内媒体及学界的各种言论来看，这种观点基本上主导了整个房地产市场。正因为房地产的投资者预期房地产市场价格只会上涨而不会下跌，再加上早几年房地产购买者的赚钱效应，以及商业银行信贷易获得性及高杠杆率，从而使得更多的住房投资者或炒房者涌入房地产市场。这就是当前房价快速飙升，购买住房就如购买白菜那样轻率的现象盛行的原因所在。如果房地产投资者一旦预期价格下跌，他们不敢也不愿意进入房地产市场，而且还迟早会把手中持有的住房卖出。但实际上没有住房价格只涨不跌的市场法则，住房不能用于投资炒作，其最终的功能应只能是居民消费居住。如果这种功能的持有者没有能力来支付过高的房价，房地产泡沫破灭也是必然。房地产泡沫破灭，金融危机、银行危机也随之而来。

从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到，中国房地产市场泡沫已经无可复加了，房价过高也不是部分城市而是有相当的典型性及示范性。国内房地产市场泡沫产生的主要原因是银行信贷过度的结果，因此，要遏制房地产价格过高，不是增加供给、加强保障性住房等就可达到，而是从问题的根源入手，全面挤出房地产投资。要做到这点，就得取消所谓改善性住房和坚决执行一套房价优惠政策；严格审查住房按揭贷款，对投资者严格限制等。如果从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上坚决挤出住房投资者，那么房地产市场高房价自然会退出。

（摘自2010年1月4日《法制日报》）

解决高房价问题 是一个长期过程

宣宇

2009年底，中央密集出台了多种房地产调控政策，旨在加强和改善市场调控，稳定市场预期，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势头。笔者认为，平抑高房价的过程可能不像表面看到的那样简单，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需要有一个承受持续高房价的预期。

经济增长模式短期内难以转型

首先，虽然2009年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政府投资拉动，但今后房地产业仍将是我国以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的核心，且短期内难以改变。房地产业不仅直接带动了大批产业链，刺激经济增长，且在其资金循环中有超过50%的资金流入地方政府，其中一部分又形成政府再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可以说，只要有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存在，房价就必然有不断向上的牵引力。

其次，当前高房价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银行信贷资金的支撑，这部分是形成房地产泡沫最直接的推动力。但覆水难收，大量已经进入高价楼市的银行贷款也需要高房价的“安全”支撑，否则，经济将面临巨大的系统性风险。

第三，我们正面临世界性产业创新枯竭。当房地产业仍是拉动经济最强有力的产业时，除了投资房地产以带动诸如建材、家装家电等行业推动经济增长，还能做什么呢？虽然这是以大量自然资源的耗费为代价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但在没有一个更好的产业驱动下，经济增长才是“硬道理”。

因此，纵使房价高企，但囿于内在动力和现实环境，地方政府也没有动力压制房价。其实，如果政府想限制投资与投机性购房，通过行政命令就可以解决：因为房地产商品的特殊性，禁止家庭超越规定的可拥有住房面积以上的购房行为。但是，因为目前高房价“挤出”了大多数普通购房者，政府才更需要投资者走进房地产市场，拉动经济增长，从而形成“高房价（及高房价预期）→挤出普通购房者、吸引炒房者→房价进一步上涨→进一步挤出普通购房者、吸引炒房者”的高房价自我强化机制。地方政府正是通过房地产及其高房价，将大量居民财富转化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投资。

区域发展不平衡将长期存在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人口的城镇化速度将远大于城市扩容和城镇化进程。由于大中城市扩容带来的成本加速递增制约了大中城市的经济边界，必然会形成大中城市规模的有限性和需求的相对无限性矛盾，这种矛盾决定了未来大中城市房价将仍然呈上升趋势。

此外，居民素质的普遍提高（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群体是每年五六百万的大学毕业生），对大中城市的房价形成巨大推力。虽然国家对大学毕业生到西部、到艰苦地区就业、创业进行鼓励、扶持和帮助，但区域协调发展才是改变

他们一味向大中城市“扎堆”的根本出路。显然，区域协调发展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居民购房意识不会轻易改变

笔者认为，除了加强保障房建设，发展租房市场是当前高房价下又一个现实的选择。发展租房市场不仅可以推迟居民初次购房时间，缓解“刚性”需求压力，更能充分利用现有住房资源，改善供求关系，从而有助于减轻房价上涨压力。根据国际经验，在较为完善的租房市场，即使房价—收入比不高，很多居民还是愿意通过租房解决安居问题。

但在我国的“有房才有家”的传统观念下，还是有很多年轻人进入初次购买的大军，他们不惜花光父母甚至亲戚朋友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积蓄，也不惜透支自己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未来预期收入，成为“房奴”，背负着经济和心理的双重压力。纵使政府着力发展租房市场，向保护租户的利益倾斜，但笔者相信，居民这种“居者有其屋”的意识短期内难以改变。正是因为这么多的购房“外援团”，支撑了中国高房价现实，可以肯定，这种社会心理和市场行为仍将长期存在。

最后，经济的根本好转和可持续发展还需要政府继续实施宽松的宏观政策，这也一定程度上减弱了房地产调控政策的作用，房价上涨有了另一个内驱力。

因此，笔者相信，一系列调控房地产的政策措施不会真正打压房地产业，也不会改变行业向上的趋势。不要指望房价在短期内会有所反转，高房价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是社会的焦点话题，解决高房价问题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摘自2010年1月4日《中国证券报》）

世界各国抑制房地产泡沫之鉴

吴继兰

美国：市场调节和政策管理相结合

二战后到此次金融危机之前，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过两次，但都是以“软着陆”的形式出现的，即房价在几年内小幅下滑或上涨非常缓慢，没有出现如同股市一样的大起大落。此次金融危机中的房价下跌，所造成的不利影响也主要体现在畸形发展的金融衍生品市场。总体来看，美国拥有一套完整科学的抑制房地产泡沫非理性发展的机制，包括许多重要的政策工具。一是住房贷款利率。美国的贷款利率几乎每天都在变动，影响贷款利率变化的因素主要有：长期国债收益率的变化、长期国债的走势、市场对长期经济发展的评估等因素，特别是美联储基准利率发生变化，贷款利率马上会随之调整，这就为政府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利和灵敏的杠杆，借以调控房地产价格走势。二是大幅提高炒房者成本。这在很大程度上将许多人拒绝在投机圈之外，减少了炒房人群。在美国，买卖房屋手续非常复杂，中介代理机构和律师都要从成交金额中收取买卖双方较高比例的费用，这极大地制约了绝大多数人炒房，遏制了房价的起伏波动。三是房屋的维护费用昂贵。美国的房产者每年都要缴纳税金，一般税率在1%以上，还有房屋保险费用等，成为拥有房屋的沉重负担。四是政府对第一套住房以外的非自住房屋在税收、贷款政策等方面都不给予第一套住房的优惠，从而大幅降低了房地产投机的吸引力。五是对非自用住宅房屋出售后的盈利征税。六是房地产统计非常及时、详细、准确，公众随时都可在政府网站上查到房地产相关指标，包括每个月新开工

数、中间房价月变化指数、房价上升和收入上升对比、房价上升和租房费用上升对比指数等科学实用的指标，大大提高了房屋买卖的信息透明度，不仅给决策部门提供了调控依据，而且有效地减少了房地产商炒作或垄断的机会。

欧洲：市场调节为主导

过去10年中，欧洲房地产价格也经历了大幅上涨，各大国中央银行前所未有地增加流动资金供给，给一般情况下没有资格获得房屋按揭贷款的购房人提供贷款的金融创新服务，以及迅速攀升的民众收入带来了房地产资产价格持续上涨。然而，金融危机以来，欧洲房地产市场步美国的后尘，进入了从繁荣到衰落的周期。据国际房地产行业组织RICS发表的年报指出，金融危机以来，房地产市场价格下跌，整个行业不景气，已蔓延至欧洲所有国家。

作为一个联系紧密的经济共同体，欧洲国家更多地信奉市场调节，由市场来调控。政府一般并不直接制定政策遏制“炒房”行为，而是通过银行信贷和国家税收等形式达到自动调节。欧洲央行主要以利率的调整为工具，在不打击经济增长的情况下，抑制在欧元区国家出现的房地产价格泡沫。欧洲央行认为，信贷增长和资产价格波动之间，长期以来都有着颇为系统化的关系，因此，欧洲央行将采取审视的态度对待房地产泡沫问题。

亚洲：灵活多样的调控政策

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为避免出现过

高的房价泡沫，也纷纷实行了灵活多样的调控政策。新加坡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推出了“居者有其屋”计划，大力建设以自住为主的经济适用房，限制居民购买该类住房的次数，监督房屋不得用于商业性经营，规定较长的房屋转售时限，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房地产投机。新加坡房地产市场分隔为“政府组屋”与私人住宅两个市场，80%以上的居民购买的是政府建造的平价组屋，而仅有10%—20%的人居住在价格高昂的私人住宅中。韩国政府建立了一套优先为无房户提供住房的制度，保障性住房占整个住房市场50%以上，规定一个家庭只允许购买一套住房，并有严格的登记存档，对拥有两套或两套以上住宅者收取高额的资产增值税，使房屋的自住性需求和投机性需求得以明显划分和区别对待，令炒房者知难而退。

对中国的启示和借鉴

一是调整房地产市场结构。按住宅面积划分出两个市场。一个市场是小户型住宅，每户只能拥有一套，政府在此类住房的建设用地上给予开发商优惠和补贴，购房要以家庭为单位购买，在购房后一定时期内不得交易，也不允许一个家庭在多个城市同时拥有住房。另一个市场是大户型住宅，不限制购买的套数，但是建设用地从严审批，购房要缴纳专门税金，购买多套住宅还要缴纳额外税金。

二是抑制炒作投机行为。对购买多套住房的，应逐级提高购房纳税标准。例如，普通百姓购买第二套房的征收50%的购置税，购第三套房的征收100%的购置税，购第四套房的征收200%的购置税，这样可以快速有效地提高炒房成本，抑制投机行为。对已购房者征收房产税，按照拥有住房的套数和面积逐级递增和累进，可以抑制房价和增加税收，又不破坏市场经济规律，使有限

的土地资源能够得到有效利用。

三是防止银行信贷的非理性扩张。货币政策不仅体现在存贷款利率方面，还体现在银行业与房地产业之间的关系方面。目前，中国的存款利率仍有上调空间，加息的可能性也一直在人们的预期范围之内，这有助于降低普通百姓地产投资和投机的热情。房地产业是资金密集型行业，房地产开发必须拥有雄厚的资金，开发商仅靠自有资金是远远不够的，其开发资金主要来自银行贷款。所以，通过对银行向房地产企业及购房者贷款政策的调整和严格执行也有助于防止金融风险积累和房地产泡沫的产生。具体而言，可以采取以下措施：限制高档商品房项目融资，重点支持优质开发企业的中小套型、中低价位普通商品住宅；严控房地产贷款总量，加大到期开发贷款的回收力度；提高同一借款人购买多套房的首付比例，贷款利率不得下浮。

四是保持人民币汇率的长期稳定。吸取日本房地产泡沫膨胀的教训，保持人民币汇率政策的长期稳定，并且阻断国际游资涌入中国房地产业。对于中国国内居民和投资者来说，人民币升值首选的行业就是房地产业，房地产是以人民币计价的资产，从房产本身和人民币资产两个角度考察，它们都有升值潜力。所以，为了控制人们的心理预期，必须保持人民币汇率的长期稳定。

五是加强对征收物业税的研究。通过征收物业税，加重购房者的经济负担，让人们不敢轻易购房。同时，房子越多上税越多，在增加国家税收，补贴穷人的同时，抑制人们购买住房等待升值的投机心理。如美国有的州50万美元的住房每年要上交2万美元左右的物业费，这样人们买房主要用来自住，不会轻易买来投资。在日本，父母把住房转赠给子女时，也要收取大概50%左右的遗产税，这也让人们不敢轻易买房投机炒作。

（摘自2010年1月6日《中国信息报》）

潜在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金名

目前,一个不为外界关注但却令人担忧的风险态势正在积聚:现在全国各级政府融资平台有8000多家,银行贷款余额近6万亿元。尤其是在融资平台贷款中,项目贷款余额近5万亿元,约相当于2008年地方财政收入的1.8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隐藏的各种潜在风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2009年10月2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强调,要规范地方政府及其融资平台的举债和担保承诺行为。

目前商业银行对于融资平台的贷款业务都有所收缩。

◆ 信贷一半投向地方政府项目

2009年上半年,在政策导向和银行盈利的驱动下,政府投资项目成为各家银行争抢的对象,而各级地方政府融资主要通过政府设立的开发公司、投资公司等融资平台进行,包括向银行贷款、发行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等。据央行统计,上半年银行投放的7.4万亿元信贷中,大约一半都是地方政府的项目贷款。

长期以来,我国银行信贷资金都大量投到央企项目中,特别是今年贷款高速增长,大量的信贷资金一哄而上,部分银行分支机构投向政府融资平台的贷款占其各项贷款的比重很高,贷款集中度过高,这就蕴含了各种潜在风险。

这是我国商业银行存在的老问题,但也是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同时更是商业银行长

期要面对的问题。商业银行贷款结构比规模更为重要。我国商业银行贷款,通常只重视规模,而忽略结构,这样的做法是不科学的。商业银行的贷款结构不仅仅关系到银行自身的商业利益与贷款效益,而且也应主动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宏观政策相配合,要将信贷资金投向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领域。

与此同时,由于今年地方财政收入增幅下滑较多,各地普遍反映财政收支矛盾突出,落实配套资金困难。有些公共投资项目安排,地方配套资金比例过大,超出了地方财政的承受能力。比如,2009年国家下达的保障性住房建设计划,全国共需投入1676亿元,其中,中央投入493亿元,占29.4%;地方配套1183亿元,占70.6%,落实困难,有些地方政府就大举借债。

地方项目融资对商业银行的依赖,实际上将在这两年持续绑架国内银行信贷的发放。

◆ 政府融资平台充满风险

据初步统计,截至2009年8月,全国共有3000家以上的各级政府投融资平台,其中70%以上为县区级平台公司。2008年初,全国各级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平台的负债总计为1万多亿元,到2009年中,则迅速上升到5万亿元以上,其中绝大部分来自于银行贷款。

而各类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其实往往都由政府筹划、组建设立并直接或间接出资,主要

负责人由政府或相关部门领导兼任,受政府委托从事开发、建设等任务,名为独立法人,实为政府附属单位。多数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本身不具有自偿能力,依赖财政拨款偿还贷款。

同时,由于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责任主体不清晰,操作程序不规范,并且地方政府往往通过多个融资平台公司从多家银行获得信贷资金,从而导致银行难以把握地方政府负债及担保状况。一旦投融资平台的项目投资收益不能覆盖成本,就会给地方政府的财政造成巨大压力,甚至最后不得不由中央财政和商业银行埋单。

为了抓住发展机遇,地方政府按捺不住融资的冲动,纷纷“举债”,致使债台高筑,为今后的经济发展埋下了隐患。如西部某县,2009年的财政收入大约12亿元,除去工资等正常支出,仅剩3—4亿元用于偿债,而该县2010年仅利息一项就要偿付18亿元。

由于我国地方政府不能破产,因此一旦政府出现财政危机,中央政府就要出手解救,如果多个地方政府同时出现财政危机,则可能会拖垮中央财政,危及整个国家的经济安全。

笔者关注的则是由此引发的金融风险,地方的融资方式并不丰富,因此其主要的融资渠道还是银行贷款,因此,地方债务的风险也就集中在银行体系,地方债务将成为银行坏账的一枚“潜水炸弹”。

由于地方政府的投资项目多为“铁公基”建设,项目建设周期相对较长,今后需要后续不断的资金投入。因为不继续增加贷款供应,必然有一批项目要断掉资金链,成为烂尾工程;但继续增加贷款的供应,则会带来越来越大的通胀风险和银行坏账风险。

有些地方政府也知道自己没有偿债能力,

但是他们更看重的是这种难逢的发展机遇。事实上,“千年不赖、万年不还”正在成为政府融资平台的突出表现。原因在于,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很多建设项目本身并不产生效益,没有可靠的还款来源。依赖地方政府其他收入偿还贷款,一旦地方政府的财力或还款意愿不足,贷款资金往往不能按期归还。而其后果,一方面可能会影响地方政府对基础设施、教育、科技等地方公共产品的继续投入;另一方面可能会出现公务员和中小学教师等相关人员的工资拖欠,影响国有企业破产财政兜底、下岗人员生活费 and 再就业、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等支付问题,严重的将会影响社会稳定。



证券化和政府债券

2009年9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士余在“中债信用增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仪式上指出,资产证券化和市政债的发展有望成为化解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的重要途径。

刘士余认为,对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带来的风险,“一方面,增量上要规范”。由于目前《预算法》不允许发行地方政府债,因此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商协会应在制度安排和产品设计上进一步创新和发展,学习和研究市政债的成功经验。而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可以对融资平台的贷款进行贷款证券化,通过使其进入债券市场来解决巨大的存量问题。

9月26日,刘士余表示,目前大量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对于地方财政偿债能力构成威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利用银行间债券市场,其增量部分可以考虑市政债。由于以地方政府为背景的融资平台的规模很大,其间接的负担已经在许多地区对地方财政的偿债能力构成威胁,地

中 国 海 权 面 临 挑 战

孔志国

我国经济对海洋经济的依赖越发凸显。国家海洋局的数据显示,2008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29662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87%。而1979年,这一数字才不过64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刚到1%。此外,中国国际贸易总量的85%以上是通过海上运输完成的,中

国商船已经遍及世界1200多个港口,世界航运市场19%的大宗货物运往中国,22%的集装箱来自中国。中国已是世界铁矿石进口第一大国,石油进口第二大国,货物贸易进出口第三大国。

在此背景下,2009年年初,中国海军赴亚

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增量要规范,在制度安排上要尽量防止不能再依靠银行贷款,可以通过市政债的形式来保证地方融资。

此前,央行行长周小川也表示,随着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逐步推进,市政债以一种融资方式逐步引起重视。

目前,正式的市政债尚未推出,但市场上已经存在市政债的替代品,比如财政部代发的2000亿元地方债,以及由地方政府组建的国企作为债券发行人的城投债,业内人称之为“准市政债”。

2009年以来,城投债的规模已经近千亿。而且,各地发行城投债的热情仍然高涨,近期仍有多家地方政府在排队等待发改委审批其城投债。

不过,城投债的激增也加剧了地方偿债的风险,毕竟城投债的最终信用主体还是地方政府,而偿债资金多来自于财政补贴。

对于由此可能引发的风险,发改委已经敲

响警钟:今年城投债发行的量比较多,有可能在未来引爆风险。

最后想说的是,银行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贷款的风险评估,很大程度上不是按照企业法人贷款的标准分析,而是基于对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状况和偿还能力的判断,但又由于并不真正掌握其总体负债规模和偿债能力,既无法做到对借款人客户评级,更不可能实现对具体贷款的债项评级。

为此,对于当前地方政府的融资,需牢牢把握三条红线不放松,即严禁发放打捆贷款;不得签署无特定项目的大额授信合作协议;对出资不实、治理架构、内部控制、风险管理、资金管理运用制度不健全的融资平台,要严格限制贷款,落实风险防范。比如考虑到地方融资平台项目贷款建设周期长,要求这类项目贷款的期限一般不得在项目建设期基础上加长10年,最长不得超过项目建设期加上15年。

(摘自《观察与思考》2009年第24期)

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这一刻在未来将会被证明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其意义并不在于一雪 100 多年前甲午中日海战失败之前耻（现在谈这些还过早），而是在于远航的中国船只在遥远的海域也能够得到政府的军队近距离提供的安全服务了，而中国也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实施 15 年之后于自己的领土之外开始对新海权的探索了。

但是，中国海洋经济的高歌猛进，中国政府和海军在遥远的异国海域书写下的远洋史上和军事史上浓重一笔，并不意味着中国海权高枕无忧，也不意味着中国对海洋的彻底征服。相反，无论是在可控还是不可控的范围内，中国海权都面临挑战。

航路安全挑战挥之不去

在那些不存在争议的海洋收益中，如何保证安全甚至主权完整始终是中国挥之不去的难题。

台湾地区显然是最大的一个变数。按理，如果两岸融为一体，不但置于中国怀抱的台湾海峡完全由中国掌控，台湾成为中国在东海、南海交界处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而且，两岸还将因为商贸的自由往来而享受到市场扩容和人民福利增加的好处。可在两岸依然存在隔阂的今天，且不说整个国家经济利益受到损害，国防利益应得的便利荡然无存，本来属于内政的台湾和台湾海峡问题，竟然成为某些国家阻挠中国崛起的利器，台独势力求诸国际力量支持的筹码，自然也是压在中央政府和全国人民心头的一块疙瘩。

和这一情形十分相似的是中国对外贸易的

海上通道。中国进出太平洋要通过众多的海峡和海路，被朝鲜海峡、大隅海峡、巴士海峡、马六甲海峡封闭着。在三条主要的出海航线中，北线朝鲜海峡、千岛群岛是必经之路，东线由日本列岛、琉球群岛、钓鱼岛、台湾岛之间的海路组成，南线则或经台湾海峡或由广东、广西沿海径入太平洋，然后经太平洋至印度洋，但无论如何都绕不过马六甲海峡。

如果台湾海峡两岸实现统一，中国在东线、南线上都会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可现状是，台湾问题的悬而未决，使得中国没有完全掌控任何一条出海航线。不仅如此，自身反而还被美、日等国主导的所谓第一岛链、第二岛链两条岛链重重包围。

在和平时期，这也许还是不太大问题，只是若出现意外，在海上就几乎被完全困住。

而近海领域海洋通道的不利局面只是一个侧面，随着中国远洋航线遍布世界海洋，中国当然有利用全球通道的需要，可是，这些权益现在尚无法得到保障。

美、俄、英、日等大国，都很重视对世界性通航海峡的控制。美国选择了 16 个世界性的通航海峡，作为维护自身海洋权益的海洋航道“咽喉”，其中，除朝鲜海峡、马六甲海峡外，曼德海峡、苏伊士运河、直布罗陀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巴拿马运河等对中国也很重要。这些海峡一旦被有关国家占据和封锁，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和能源进口都要遭受很大的损失。前些日子，“德新海”轮在印度洋被索马里海盗劫持就是一个。

而另外一个让人尴尬的事情是，虽然有学者一直呼吁我们应该重视对曾母暗沙、黄岩

岛这样的本来属于中国、在国际上没有主权争议的海洋权益，强化主权，积极开发。可由于各方面重视程度不够，一直没有拿出切实的应对措施，结果导致潜在争端形成了公开麻烦。2009年2月下旬，菲律宾议会宣布黄岩岛为其主权领土，曾母暗沙的处境将因此而岌岌可危。

海洋收益困局

在自己完全可以左右的海洋收益中，中国的表现有待提高。在潜在的海权收益方面，中国也是刚刚迈出第一步。

世界海洋面积的2/3属于公海，国际海底“区域”总面积达2.517亿平方千米，且各种再生和不可再生资源储量丰富，比所有国家主权海域资源的总和还要多。因此，任何有见识的国家都会尽力扩大自己在公海和国际海底“区域”的利益。

中国在公海享有符合国际法规定的各项公海自由，包括航行自由、飞越自由、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自由、建造人工岛和其他设施的自由、捕鱼自由以及科学研究的自由，还有权分享国际海底“区域”内的其他资源。

但是，迄今中国除因为对外贸易和国际交往的增多较为充分利用了航行自由、飞越自由、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自由等权益并在太平洋海底已申请一块7.5万平方米的多金属结核矿区外，在其他海洋权益获取方面少有建树。

中国自北向南被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所环绕。这4个海区的总面积约473万平方米，依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大陆岸线总长18000多千米，岛屿岸线总长14000多千

米，500平方米以上沿海岛屿6961个（不包括台湾岛、香港、澳门诸岛）的中国，可以主张管辖的海域约300多万平方千米。如此广阔的“蓝色国土”，其中蕴藏的丰富海洋资源，以及在运输上、国防上可能给中国带来的便利，显然都是中国海权收益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受闭海、半闭海和岛链等地理因素的影响，中国自北到南与朝鲜、韩国、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越南、印尼8个海上邻国都存在海域划界问题，需要划定的海上边界总长约7000多千米。中国300多万平方千米的“蓝色国土”能否得偿所愿，可能很大程度上还要取决于国际法院或者国际海洋法院的判定，但无论如何，都需要得到周边相关国家的认同或者默认。

在这种情况下，岛屿主权争端亦势必长期陷入僵持。根据一些国外学者的统计，一个直径仅为1英里，面积约0.8平方英里的小岛，从围绕该小岛的领海基线算起划定宽度为12海里的领海，则该小岛可以拥有面积190倍于其陆地面积，多达155平方英里的领海海域。若再考虑到还可以围绕该小岛划定宽度为12海里的毗连区和200海里的领海以及可多至350海里的大陆架，同时考虑到这样大的海域附带的可再生资源、不可再生资源，其利益更是惊人。

因此，日本对中国在钓鱼诸岛，越南、菲律宾等对中国在南海诸岛本来不应有任何争议的主权持有异议，日本对两块礁石组成的“冲之鸟”礁、韩国对苏岩礁精心经营便在情理之中。它们实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摘自《中国经济周刊》2010年第1期）

高行政开支， 削弱国家竞争力

据财政部、发改委、统计局联合调研，中国政府公务用车(不包括医院、学校、国企、军队以及超编配车)，每年要花1500亿—2000亿元。有专家认为，这还是一个大大缩水的数字。若加上公款吃喝和公款出国，“三公消费”占到全年财政总收入的两成以上。

“三公消费”如此惊人，中国政府运行成本之高可想而知。据保守估算，中国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是发达国家的四五倍。从2005年起，中国财政行政事业公用经费支出每年增加1000多亿元，增速远超居民收入和政府收入的增速。

中国政府管的事多，需要的钱也多，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政府的主要职能是确保社会公平。政府在行政开支上的支出少一点，就能用多一点的钱来促进公平，反之就会不利于公平。

过大的行政开支不仅造成浪费，更会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并引发公众的不满，削弱政府的公信力。

历史给了我们足够的警示。历代封建王朝，几乎都遇到过政府机构日趋庞大，民生不堪重负而引发矛盾激化的社会问题。很多国家也都经历过因行政开支过多，财政赤字太大，民众负担沉重，执政党地位难保的政治动荡期。

行政开支是世界各国政府永远的难题。解

决这个问题没有一劳永逸的办法。成功的经验表明，只有根据实际不断调整，通过有效的管理和监督机制，才能达到节俭开支的目的。

从技术上说，这项改革的难度并不大。随便参照一个发达国家的做法，都能为中国打造出一个可见效的改革方案。而且，只要提供必要的条件，中国媒体和老百姓也有热情和能力，发挥有效的监督作用。

但它并不是一个技术性问题。“三公消费”几乎延伸到中国整个公务员群体的生活领域，形成了一个异常庞大的利益链条。想一想，每年数千亿消费额，养活多少人和多少产业，牵涉到多少人的切身利益。直到今天，还没有哪个中国官员是因为公车私用、公款吃喝下了台。

事实上，1998年以来，“三公消费”就一直是政府改革的一个重要话题。可十几年来，改革并没有显现出太大的实际效果。现在能够公开公布这一数据，是朝着改革方向迈出的坚实一步。下一步，将取决于能否有更坚强的决心，拿出更具体的措施，动一动真格的。越朝后拖，问题就会越严重，改起来也就越难。

中国政府的动员力和高效率，已为世界所见证。如果再能实现相对较低的运行成本，势必会极大地提高中国的国家竞争力，这也是中国人对政府管理、国家发展模式的新探索。

(摘自2010年1月6日《环球时报》社评)

“诚信”贪腐 是官场的黑色幽默

周虎城

原韶关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叶树养被正式起诉了。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叶树养一边大肆敛财，一边平步青云，还当上了惩防腐败体系建设考核工作组组长，极具讽刺意味。据说，此公在长期的权钱交易中，总结出一套“五不”原则，即“不主动索要钱财、不办事不收钱、不催讨该给还没给的钱、不讨价还价、不嫌弃送多少钱”。他从来不强讨、硬要，而是采用互惠、坐等的方式，大抵算得上是“诚信”贪腐了。

贪腐也搞起了“诚信”，叶树养并不是第一例。原安徽省定远县县委书记陈兆丰正是这样，定远是全国重点贫困县，农民人均年收入仅2000余元，但陈兆丰却贪腐总额近千万元，而且长期以来贪而不倒。据说这与他很讲“诚信”有关，他有“三不”原则：“办不到或没法办的事情不收，领导或熟人托办的事情不收，嘴巴不严的人不收。”这些贪官在当地官场叱咤风云，纵横多年而安然，归结为一点，就是和当地的官场政治生态融为一体，官员体系由于所谓的“诚信”而逐步形成利益共同体。在利益共同体之下，外界很难觉察贪腐，即使有所怀疑，也苦无证据，而官场中人，又因“诚信”而休戚与共，不会因此起内讧，向纪委递材料。

官场从来不缺乏黑色幽默，叶树养的“五不”原则不是偶然的，而是官场的一种生存智慧。如果不是某一事件偶发被顺藤摸瓜，恐怕叶树养等人将依然身居高位，干着一边反贪腐一边搞贪腐的双面营生。叶树养之所以搞“五不”，其实是由于

他知道贪腐的风险，但又要通过“五不”尽量地采取措施降低风险。为什么要搞“五不”，无外乎就是要别人不记恨于他，不仅对他“威服”，也对他“诚服”。和和气气发官财，这不正是不少贪腐高手擅长玩弄的一大策略么？

这种贪腐却又是十分危险的。由于和气，外界难窥堂奥，监督自然缺乏。在这种情况下，蝇营狗苟之事难免滋长，人家拿钱来行贿，总归不是要来行善举的，而是要以小钱博大钱。他们倒是因为“诚信”贪腐而拿到了自己想要的权力、地位和金钱，可官场的秩序已经发生变化，“当老实人、做老实官”便会因为不送钱、不行贿、“不懂事”而逐渐沦为某个官场的边缘势力。长此以往，一切单凭银子开路，犯罪者可以逃脱法网，贪腐者可以高枕无忧，官员们岂不人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沦入腐败大网中？最后受害的必定是无权无势无钱的平民老百姓。

（摘自2010年1月12日《南方日报》）

官员应酬风的一果多因

江曾培

官员中盛行的应酬风，是官场的一大病灶。尽管民众对此批评声不断，但他们不入耳，更不入心，仍然是“我自应酬不休”。

也有些官员并不醉心大吃大喝，是不得已而周旋于应酬场的。相较那些热衷于应酬的“主动式应酬”的官员来说，这种不得不“被动式应酬”的官员也许更多。这种“被动式应酬”，可说是一种无奈的从众。它反映了以吃喝为标志的应酬之风的风头之猛，即使想逃避它的，迫于其气势，

也不得不无奈地从众。比如，时下过多的会议，过滥的检查评比，就是产生应酬的温床。有人虽然内心想“走宴”，但是，现行行政管理体制权力资源过于集中，作为下级，谁又敢不去应酬这些过滥的会议与过多的检查评比？可以说，行政管理中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是造成官场应酬风的重要“风源”。

再有，官场上的应酬风，也是“拉关系”的不正之风在官场的反映。有些官员不重思想能力的提高，而重“关系”的发展。他们从党校学习回来，津津乐道的不是学到了什么，政治思想有哪些提高，而是结识了多少“哥们”，扩充了多少人脉。他们在日常工作中，特别重视的也就是扩大自己的交际圈子，从而把宝贵的学习工作时间都投入到应酬中了。此外，官员应酬多为公款支付，公共财政疏于管理监督，为应酬风提供了经济基础。

基于上述，我以为，官场的应酬风是个一果多因的问题，需要打出“综合拳”进行综合治理。既要加强官员的革命人生观与思想作风教育，又要加大行政管理制度的改革，还要健全公务支出的财政管理监督制度。唯有思想教育与相关制度改革双双取得实效，官员热衷应酬的不良风气方能有效得到遏制。

（摘自2009年12月31日《解放日报》）

问责常规化，不放过

庸官懒官太平官

广州市监察局最近宣布，今年以来广州有35位党政领导干部被问责。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大部分并非由于重大安全责任事故而被追究，而是因为日常工作中的作风问题、不作为、乱作为而

挨了问责的“板子”。

在公众眼中，近年来轮番上演的“问责风暴”主要都是针对重大群体性事件和重大责任事故中的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似乎犯了大事，才会被追责，而官场中司空见惯的懒官、庸官、“老爷官”、“太平官”，却没几个遭受过问责。

“做官要做副，不要做常务”“平平安安占位子，忙忙碌碌装样子”“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些“流行”说法也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部分基层官员不愿承担责任、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不良心态。

2009年7月中办和国办印发《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已明确规定了七种需要问责的情形，其中不仅有重大事故和群体性、突发性事件，还包括其他造成恶劣影响的失职、渎职行为。但许多地方和部门却习惯性地对“小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实际上，问责制作为改善我国政府管理的重要举措，其目的就是通过各种形式的责任约束，限制和规范政府权力和官员行为，最终达到权为民所用的目的。因此，问责制应对所有不尽责、不负责任的官员，都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使各级领导干部普遍感到压力，这样才能真正起到惩戒作用。

对领导干部的问责常规化，还应避免走两个极端。一种是流于形式，将问责制置于高阁，或当成偶尔“作秀”的工具；一种是乱用、滥用，在缺乏规范的情况下个人化、随意性地使用问责制。

问责制在我国才刚刚迈开步伐，如何使其更加规范、科学和可操作，仍需一个不断探索、完善的过程。各地各级政府应对问责的内容、方式、程序等进行更为科学细化地规定，严格按照责任追究，严格按照程序问责，使问责真正成为悬在官员头上的一把“利剑”。

（摘自2009年12月28日《新华每日电讯》
记者车晓蕙 吴涛）

谁把房地产商 宠成蛮横的孩子

成 露

即便赚得盆满钵满，开发商依然不改“老赖”的毛病。

近几年来，在全国不少地方公布的欠税“黑名单”中，房地产企业都是大户，并且一些房企因拖欠时间长，已成欠税的“钉子户”。耐人寻味的是，照楼市这几年来的疯狂涨势，尤其是2009年的癫狂情形，开发商显然并不差钱，但他们仍乐得当“老赖”，戴着欠税“钉子户”的帽子仍能招摇发大财。屡屡当赚钱大户，却屡屡成欠税大户，又屡屡被曝光，最后屡屡一曝了之，奈何不得，房企如此蛮横，谁把它们宠坏到了如此地步？

去年4月，重庆市地税局公布了该市128家欠税企业名单，其中，房地产公司和相关企业数量达70余个，欠税金额最大的一家房地产公司各类欠税金额高达4000多万元；去年2月份，广州市地税局发布2008年第4号欠税公告，曝光欠缴地方税收200万元以上的企业有63家，涉及房地产行业的多达49家，占了77.78%……

一个习惯了赚取暴利的行业，一个习惯了“房子像白菜一样卖疯了”的行业，一个习惯了“数钱数到手软”的行业，却不习惯履行基本义务，履行社会责任，这种强烈的反差正是全民宠坏房企和开发商的一个突出表现。

房地产在很多地方都是支柱产业，从地方政府到商业银行，都把房地产和开发商当成了“聚宝盆”。在有的地方，奉行的是“谁挡投资者的路，谁就是历史的罪人”；在有的地方，无论是政策

还是官员，处处为开发商撑起保护伞；在有的地方，开发商甚至沦为一方恶势力……恃宠而骄的房地产，恃宠而骄的开发商，在中国楼市的黄金期里，在支柱产业的“尊贵”身份下，无耻而无畏地洗劫着几代人的财富，一夜铺成自己跨进亿万富翁俱乐部的台阶。

那些集万千宠爱从而赚得钵满盆溢的开发商，不去热心慈善事业也就罢了，法律规定的义务总不能怠慢吧？按章纳税是每一个企业和公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然而，连基本义务都不愿承担的开发商，还能奢求其有多少社会责任心？

被宠坏的孩子，是不是只有吃点苦头，才会懂得做人的基本道理？房产商能不能把百姓敬重放在心头，能不能改变暴利的逐利心态，要看社会能不能对房地产商放弃宠爱甚至是溺爱，如果一张口哭就给更多的糖吃，房地产和房地产商将有理由继续藐视社会责任和民生困境，继续在市场上睥睨一切，用它妖冶的暴利之花刺伤社会公平。

（摘自2010年1月3日《工人日报》）

网民成为压力集团 是国家进步的象征

祝华新

从腾讯QQ网友结成QQ群，到“百度贴吧”基于地名、机构、职业和兴趣爱好等关键词，聚集利益相关人群，还有博客圈、豆瓣网讨论群组、BBS网友的“版聚”等等，中国网民正在网络上结成各种虚拟的社群，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网民作为具有舆论能量的“新意见阶层”,正在形成一个有现实影响力的虚拟“压力集团”。(按照政治学定义,压力集团“pressure group”是指那些致力于对政府施加压力、影响政策方向的社会组织或非组织的利益群体。)

面对贫富冲突、劳资矛盾、城市拆迁、农村土地流转、环境污染、医疗教育、道德失范等问题,中国网民总能仗义执言,并经常能改变公共政策的方向。这种力量源自3.38亿中国网民以鼠标投下的民意表决票,源自他们的正义感和良心。

当然,中国网民群体,包括网络管理员和版主在内,多为30岁以下的年轻人。互联网的匿名环境,海量帖文的气氛渲染,观点相近人群频繁沟通,更容易产生“群体激化”,并可能发展为人身攻击,甚至威胁社会正常秩序。2009年的一些突发事件也提醒我们,要警惕网络舆论事件中非理性情绪的蔓延。

但是,作为一支新生力量,中国网民发出的声音即使出现高分贝的噪音,也仍然是社会多元意见构成和多元利益构成的客观反映。网民作为“压力集团”,现阶段在若干具体利益问题上具有温和表达不满和不服从的特征,但不是政治组织,不会对社会稳定产生颠覆性影响。

相反,当某些公务员、干部、警察、城管、宝马车主、“砖家”(专家)在网上经常处于被不分青红皂白地围攻的尴尬境地时,是不是应该想一想,这些网络上的“弱势群体”在现实中是不是因为过于强势或突破道德底线而难以制衡?

可喜的是,政府对网络舆论应对提速,并加大对严重违背民意、招惹民怨的官员的问责力度,一个网上官民良性互动的局面正在形成。

(摘自2009年12月30日《中国青年报》)

宽容是一种

让人感动的

美德和大爱

白丁

宽容,是一种让人感动的美德和大爱!

在现实生活中,人际间磕磕碰碰在所难免。吃亏、被误解、受委屈之类不愉快的经历,每个人都曾有过。面对朋友间的误会,同事间的纠葛,邻里间的纷争,夫妻间的争吵,若斤斤计较,会自寻烦恼,制造痛苦,徒伤感情,甚而结冤。有多少人因缺少宽容,为琐碎小事而耿耿于怀,甚至恶语相伤;有多少人因缺少宽容,使正常生活陷入泥潭,生活暗淡无光。人际间的冷漠、隔阂会在心头郁结成冰。常听有人说“累”。殊不知,每个人都可以很轻松、很潇洒,前提就是彼此多些宽容,少点苛求。你用纯洁的眼光观察大自然,她是那样的美丽和动人;你用喷火的眼光观察大自然,整个世界就如同火海。

面对令人不愉快的事,最明智的选择就是宽容。宽容包含着理解和原谅,显示出胸襟、坚强和力量。天空收容每一片云彩,不论它美丽或丑陋,所以天空才能广阔无比;高山收容每一块岩石,不论它巨大或渺小,所以高山才能雄伟壮观;大海收容每一朵浪花,不论浪花清冽或混浊,所以大海才能浩瀚无比。《悲惨世界》的作者雨果说:“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宽阔的是人的胸怀。”宽容是一种博大的情怀,它能包容人世间的喜怒哀乐;宽容是一种境界,它能使人生跃上新

的台阶。“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有这样的度量，还有什么东西容不下呢？

宽容是一种品格、一种境界，是一种超然、一种美德。宽容是一座桥，能使人由混沌走向清醒，由愚昧走向明智，由忧心忡忡走向坦荡，使人放弃个人得失的锱铢必较，着眼于人生的宏大追求。宽容的受益者绝不仅是被宽容者，还有和他们一样多的宽容者。宽容别人，快乐自己。能容天下人，才能为天下人所容。宽容这座桥的此端是愤怒、悲伤、心碎、失望、不安，桥的另一端则是祥和、理解、喜悦、激动和爱。从此端到彼端，走过这座桥，能将人世间的心灵沟通。走过这座桥，人的生命就会多一份空间，多一份爱心；人的生活就会多一份温暖，多一份阳光。

（摘自2010年1月6日《中国纪检监察报》）

站立的心灵

胡运生 胡运鑫

贝多芬在维也纳邂逅了李希诺夫斯基亲王。亲王发现贝多芬是一块“稀有金属”，便邀贝多芬住进了王府。对亲王一家无微不至的关爱，贝多芬心存感激。但当亲王企图迫使贝多芬改变自己的意志时，他勃然大怒，并立即搬出亲王的宅邸，宣布与其绝交。他不想把自己的音乐与金钱权势画上等号，不想让别人对自己的音乐信念横加干涉。正是这种在权势面前，让心灵站立的特立独行的精神，使贝多芬赢得了世人永远的敬重。

心灵的高度决定人格的高度与灵魂的高度。贝多芬不同于他人之处，就在于他始终保

持让心灵站立。贝多芬不愿为取悦他人而创作，更不愿为名利而创作。他用音乐表达自己与命运、与世界拼搏的真实而深沉的感受。贝多芬的音乐展现了他的心路历程。贝多芬那气势磅礴、惊心动魄的充满自由感与崇高感的音乐，来源于他那颗不畏权贵、睥睨一切的站立的心灵。这也是“贝多芬之谜的全部”。

站立的心灵呼唤人格独立，不受嗟来之食，不在依赖中消亡。他用平和诠释深刻，用简单应对复杂，用个性挑战自我，用智慧演绎精彩。他们以本质的执著，坚守在别人无法坚守的地方，强势前不屈折，“眼中无明月，明月在心中。”心灵站立者不会在庸俗的泥淖中沉沦，纵使在庸俗的嘲笑里，依然保持着一份清醒和独立，以胸中的浩然之气捍卫自己人格的完整，并永远保持住自己的高度！

心灵站立是一种宽广的胸怀。人生贵在心灵站立，贵在灵魂挺直，贵在思想行走……高尚者可以克服竞争过程中跃动着的嫉妒情绪，卑下者往往因它毁害别人甚至毁害自身。让心灵站立，以一片真诚和坚守去面对生活，“人可生如蚁而美如神”，这是一个有思想有灵魂的人，一个散发着智慧的人终生追求的境界。适者生存，寡者清明，智者玄通。歌德说过：“人类孩儿最高的幸福，就是他的人格！”让心灵站立，把自己的生命自觉地与社会意志结合在一起的人，才会宠辱不惊，以坚守自己灵魂的是非作为生命的最高目标。真理不会察言观色，无论世界怎么变化，它都以自己独有的面貌存在着。心海茫茫，航灯不灭；心路漫漫，追索不休；心岸遥遥，寻觅不止。

站立是为了行走，行走是为了前进，前进是为了高远。人生是一次长途旅行，与其任生命在牵绊和纠缠中飘零，不如坚守岑寂，把梦的希冀，注入生命的河流，让心灵站立，在天地间自由地遨游。

（摘自2009年12月19日《中国劳动保障报》）

从政治乱象看台湾政治市场及其影响

朱松岭

台湾社会政治乱象频仍：街头暴力有之、“议会”打闹有之、媒体绑架有之、所谓民主社会不许谈“统一”者有之……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透过现象看本质，这是“台湾式民主”使然，也是台湾政治市场的必然表现。“政治市场”是新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社会学中引入“政治人”的概念后逐步形成的、研究政党政治的新的方法论。用这套理论透视台湾政治似乎比较贴切。

台湾式民粹主义：台湾政治市场的实质

民粹主义因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不同而具有概念的模糊性和内容的复杂性。作为政治运动，民粹主义主张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并把普通民众作为政治改革的惟一决定力量，平民化便成为民粹主义政治运动的本质特征。作为一种政治统治策略，民粹主义是动员平民参与政治进程的方式，因此，民粹主义几乎完全等同于政治家的蛊惑鼓动技巧。强调“全体人民”、“全体群众”的民粹主义和民主只有一步之遥，但是民粹主义将民主极端化又可能背离民主政治的初衷，走向与维权主义和独裁政治相联的政治。

台湾式民粹主义除了具有上述民粹主义的本质之外，还有其特点。台湾的民主有些畸形，其畸形之处在于“因应国家同以前之需要”所实施的民主只是在全中国的小范围台澎金马地区实施，而其“宪法”的法源则是包括大陆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因此，这种民主只能对台澎金马地区的民权、民生问题适时所谓“公投”，而无权对国家领土、主权问题指三道四。另外，维护法制是实施民主的应有之义，台湾式民粹则没有。

“台独”和“独台”：台湾政治市场的特点

台湾式民粹政治形成的原因和争权夺利有关，说到底，其民主规则是政治团伙争权夺利的结果，是分赃的标尺，而非融入公平、正义的神圣民主规则。自蒋经国去世后，国民党内江不断，民进党趁火打劫，两党在“公投”、“单一选区两票制”等问题上达成的妥协都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可以说，为了私利牺牲小党的利益、台湾人民的利益，整个中国的利益、中华民族的利益都稀松平常。因为，

政治市场既然也是一种市场，这种市场就以利益最大化为根本追求，公平、正义、良心、国家利益、人民利益都可以作为争取利益最大化的工具！

台湾岛内的两大政党国民党与民进党在争夺利益的过程中形成了“独台”和“台独”两大特点，并以此为自己的产品特色，在政治市场上广而告之，形成了媒体、政党、财团等一条龙的产品体系。

民进党本身就是反对国民党的产物，其成立之初并非是一个“台独”政党，只是为了和国民党相区别，形成自己的政党特色才逐渐吸收、融合了种种“台独”力量，形成了在国家认同、政党认同、制度认同等层面成系统、有体系的“台独”主张，他们的主张和“台独”、“台湾国”密切相关，去掉了“台独”就要了他们的命。国民党本身是国民政府的执政党，为了捞取选票，其被迫提出放弃“反攻大陆”，转变成一个地区性政党。这个打着“中华民国”旗号，却又再无“反攻大陆”野心的政党为了在台湾岛内生存和发展，为了获取台湾政治市场的利益，只好将“中华民国”和台湾相联结，形成其“独台”的四不像方针。不管是民进党当局的“四不一没有”，还是国民党当局的“不统、不独、不武”都是“台独”和“独台”的畸形表现，都是为了当前利益而不顾未来和台湾人民幸福、国家繁荣昌盛、民族自立自强主张的表现。长此以往，这种鸵鸟心态带来的危害可想而知。

对两岸关系的影响：难以增强互信

本来，从理论上讲主张“九二共识”的国民党重新上台执政，似乎两岸关系又回到1999年李登辉提出“两国论”之前的情景。但实际上，台湾已经在10年内形成了政治市场体系，这种表面的相似已经被台湾政治实质的变化所动摇。

因此，在2008年重新启动的两岸两会协商，虽然是在“反独”和“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形成的，但进一步增进两岸互信似乎较为困难。因为，如果台湾政治市场不用选票改变“台独”和“独台”的民粹主义，两岸和平发展往前推进就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去等待。

（摘自《观察与思考》2010年第1期）

低碳生活，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吴学安

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频繁、物种灭绝……这一切无疑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而“低碳生活”正成为一种人类试图自己拯救自己的生活方式。

低碳生活走近你我他

南极冰盖的冰山融化得比以前快了，乞力马扎罗山上的雪开始消融，沙尘暴来得比以往更猛烈了……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正在承受着气候变暖带来的不适。科学研究表明，人类活动是导致地球大气层中的温室气体不断增多以致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过去的100年，是过去1000年中最暖的100年；而过去的50年，又是过去1000年中最暖的50年。

全球气候变暖会造成人类大劫难，是一个伪辩题还是一个真命题？有人认为气候变暖会使全球温差减少，有利于增加世界粮食产量，尽管会使部分传染病易于传播，但综合比较，利大于弊；有人则认为气候变暖，会使海平面上升、很多濒危珍稀物种灭绝、极端气候事件增加，对人类百害而无一利。

现在世界各国已经开始采取行动，加大对清洁、可再生能源以及环境友好型技术的投入和研发力度，积极发展绿色经济。每一名地球公民也开始注重节能，不奢侈、不浪费，用实际行动呵护地球的未来，立志做一名“低碳生活”的践行者。

“面临全球气候系统崩溃的危险，我们必须行动起来，不想当气候难民，就要当气候公民。作为一名普通的地球气候公民，只要我们从身边小事做起，实践‘低碳生活’，注意节电、节油、节气，满足基本需要，限制奢侈浪费，就能产生巨大的节碳效果。”这是南京20家环保组织所发倡议书中的一段。

对于低碳生活，人们遭遇着类似的尴尬：知道保护环境的重要，也知道保护环境人人有责，

但是，为了提高生活质量，却不得不以增加碳排放为代价。尽管人们不能避免碳排放，但却可以减少碳排放。专家指出，每个人都不可能过“零碳”的生活，在资源匮乏的当下，我们要做的是，把有限的资源用于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限制奢侈浪费。同时，养成“低碳生活”理念，在可选择、可替换的条件下，首选自然、环保、健康的生活方式。

宋先生是一名机关公务员，也是一名忠实的低碳生活践行者，现在他通过记日记的方式天天“算计”自己的低碳生活。最初接触低碳生活，看到报刊上一则报道说，每消耗100千瓦时电就等于排放了78.5千克的二氧化碳，需要种上一棵大树才能够把这些排放出来的二氧化碳给吸收掉，真太可怕了！这之后，他的生活方式开始发生了改变。如在今年夏季，他就在家坚持用电风扇而不开空调，因为开一个小时空调就相当于0.621千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而如果只是开风扇，每个小时的碳排放量只有0.045千克，前后相差太远了！为了自己“低碳生活”，他今年将私家车换成小排量的别克凯越，因为小排量车不仅环保且也还节能。

如果你乘飞机旅行2000公里，那么你就排放了278千克的二氧化碳；如果你用了100度电，那么你就排放了78.5千克二氧化碳；如果你自驾车消耗了100公升汽油，那么你就排放了270千克二氧化碳……曾几何时，我们的生活开始用“碳”来计算了。

其实，“低碳生活”细节，贯穿在家居生活的各个环节，就拿日常生活用电来说，也许加入到低碳一族当中并非难事。比如：家用电器的插头插座接触良好才能节电；电水壶的电热管积了水垢后要及时清除，这样才能提高热效率；熨烫衣物最好选购功率为500瓦或700瓦的高温电熨斗，不仅升温快，还能节电；所有的家用电器

尽量不使用“声控、光控、遥控”等作为控制开关，这样可节电 10%到 15%……这样看来，每个人都能为全球气候的积极变化作贡献。

“低碳”渗透在生活点滴之中

《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中有一句名言：“地球不是我们从父辈那里继承来的，而是我们从自己的后代那儿借来的。”为子孙后代留下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地球家园，需要低能耗、低排放的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低碳，英文为 Lowcarbon，指较低（更低）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为主）排放。低碳生活是指生活、工作时尽量少耗用能量，从而减低碳特别是二氧化碳的排放。如果说保护环境已成行为准则，低碳生活则更是我们急需建立的绿色生活方式。简单理解，低碳生活就是返璞归真地进行人与自然的互动，主要是从节电、节气和回收三个环节来改变生活细节。

低碳生活，在人类生活受到气候变化威胁的时候应运而生，它不是时尚，而是地球向人类诉求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不少人以为所谓低碳经济、低碳生活主要是企业的事情，与自己关联不大。实际上，这些例子就在我们身边。节约一度电、节约一滴水，都是低碳生活。低碳生活绝不是一场秀，而是必须紧迫面对的生活新观念。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减碳足迹。

众所周知，小汽车族是排放二氧化碳的主力，随着私家车进门入户，有车一族呈迅速扩张之势。然而，这些小汽车的拥有者有相当多一部分不是因为工作、生活需要，而是将小汽车当成身份的标志、财富的标志。你没有小汽车，我有小汽车，我的身份就比你高了。都有小汽车，但我是小排量的，你是大排量的，我就也想换成大排量的。尤其是一些政府官员更是将小汽车跟官阶、级别挂上钩，好像到了什么级别没坐上什么车就丢了脸。

江苏绿色之友协会现在正在倡议做一名“绿色出行达人”活动。对这样的倡议，生活中已有先行的“碳路者”。家住连云港的武先生尽管早在去年就成为一名有车族，但仍每天早晨 7 点整会准时从东区新建的居民小区出发，一路步行，穿越四条主干道到单位上班，全程 6 公里花 40 多分钟。除了大风大雪天气，44 岁的武先生已经坚

持了好几年。按照专家推出的“碳”路行动计算器计算，每天来回 12 公里，公交车排放二氧化碳约 250 克，与开私家车相比，减排 5.66 千克，而步行则是“零排放”。日积月累，就是一笔巨大的减排数字。

或许有人认为，即使自己“低碳”了，也挡不住工矿企业的违规排放。但是，冰川融化、气候恶化，每个人都将受到惩罚。“低碳生活”带来的其实是一种新的生活质量观。如果环境恶化，人们的生活质量也很难提高。需要厘清的是，过“低碳生活”，并不是意味着就不能开车、住大房子、享受空调了。低碳的真实含义是要给人们身体健康提供最大的保护和舒适感，对环境影响更小或有助改善环境。如欧洲现在建设了很多零排放建筑，隔热效果非常好，在自然通风的条件下，隔热层可以把室内温度调控到一个合适的水平，且能保持很长时间。在交通领域，可以开发太阳能汽车、生物燃料汽车等，同时大力发展公共交通。

低碳生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其实就是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低能量、低消耗、低开支的生活方式。事实上每一个普通公民在举手投足之间就可尽享“低碳生活”。譬如倡导低碳生活方式的公益环保网站“互联网森林”的首页上，平易近人的 10 件减排案例就生动有趣：少用一个塑料袋，减排二氧化碳 0.1 克；5 层以下，以爬楼梯代替坐电梯，每次平均可减排二氧化碳 600 克；选择应季蔬菜水果，每千克减排二氧化碳 400 克；夏季空调调高 1℃，每台每天可以减少排放 175 克二氧化碳；一棵树，一年可吸收 18.3 千克二氧化碳……

低碳生活就在我们身边，节约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装修中少用装饰灯、选用节能灯管，这些都是普通人可以做的：每天的淘米水可以用来洗脸洗手，而且绝对是天然的美白产品；将废旧报纸铺垫在衣橱的最底层，不仅可以吸潮，还能吸收衣柜中的异味；用过的面膜纸也不要扔掉，用它来擦首饰、擦家具的表面或者擦皮带，不仅擦得亮还能留下面膜纸的香气；喝过的茶叶渣，把它晒干，做一个茶叶枕头，又舒适，还能帮助改善睡眠……“低碳”并不仅仅是经济的事情，个人在生活中同样也可以选择低碳生活方式。

（摘自 2009 年 12 月 25 日《科学时报》）

“蚁族”，世界大城市的难题

像蚂蚁一样群居而忙碌的中国年轻人群体“蚁族”，在岁末年初曝光在中国和世界面前。蚂蚁有25万个脑细胞，是最聪明的昆虫，同时又是一种群居动物，它还有很多被人类称道的精神，如能承受重负、勤勤恳恳、永不言弃。当中国的社会学者用“蚁族”来定义一个特殊的、出现只有四五年的“弱势阶层”——“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后，这个由中国人发明的词汇就频繁出现在美日韩等多国的报道中，它们在本国寻找相似群体，也在分析着其中的原因。“蚁族”或许会像“知青”、“下岗职工”、“农民工”等词一样，成为记录中国发展和变迁的一个专有名词，它提醒着人们，国家就业形势依旧严峻，人口流动中存在更复杂的问题。一位中国社会学者认为，应对中国未来人口老龄化的挑战要靠这一代大学毕业生，为“蚁族”找到出路，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就是关注社会的未来。

“蚁族”现象被复杂分析

引起国内外议论的《蚁族》一书是一份中国学者的调研报告，它给读者讲述了“北京有10万人，据称全国约有一百多万人”的特殊群体：“80后”高校毕业生，收入不高，生活拮据，工作不稳定，绝大多数人没有“三险”和劳动合同，为省房租聚居在中国大城市的城乡结合部或远郊。

中国“蚁族”最先引起韩国媒体的关注。去年11月以来，韩国YTN电视台、《韩民族新闻》等先后报道了这一现象。

韩国YTN电视台还对“蚁族”进行了实地采访，并讲述了邓昆（音译）的故事。他2007年从昆明一家大学毕业后来到北京，现在月收入仅1000元人民币，为租便宜房子不得不住在远郊区的唐家岭。《韩民族新闻》介绍了《蚁族》一书及研究这一群体的中国学者廉思，称《蚁族》是对部分外地来北京的“80后”大学毕业生生活实态的调查，在北京引起广泛关注和共鸣，并形容“这本书是中国版《88万韩元家庭》”（一本韩国畅销书，主要

讲韩国家庭间的贫富差距，月收入88万韩元属低收入家庭，约合人民币5000元）。

新加坡《联合早报》1月4日也以“谁为‘蚁族’撑起一片蓝天？”为题议论说，这代人本处于承担社会和家庭责任的阶段，但现在却为养活自己而挣扎；本来是指点江山、满怀激情的阶段，却为物质生活所羁绊而变得老气。他们拼命工作只能维持基本的生活需要，甚至不敢结婚，中国的“80后”并非想象般“潇洒”。

日本《读卖新闻》去年11月16日报道说，被称为“蚁族”的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正在增加，解决中国就业面临的“大冰河期”并非易事。日本共同社2010年1月3日仍持续关注着中国的这个特定群体，并以“‘蚁族’剧增成中国社会不稳定因素”为题分析说，虽然“蚁族”剧增的直接原因是大学数量的增加和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是与日韩一样，其背景还在于社会的不平等。文章还说，1998年中国的大学生只有340万人，而随着1999年高校扩招和民办大学的增加，到2008年时中国大学生数量达到了2150万人，而中国作为“世界工厂”需要更多的是简单劳动者，希望当“白领”的大学毕业生肯定会供过于求。文章说，“蚁族”大多来自小地方，肩负着父母的希望、怀着成功的梦想来到了大城市，可现在却尝尽受挫的滋味，他们“不指望获得高薪，现在需要的是稳定的工作”。美国报纸将“蚁族”直译为英文“Ant tribe”。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认为他们“在实现自己的雄心时遭遇挫折”。

“蚁族”在全球大都市被复制

韩国重视对中国“蚁族”的报道，是因为韩国社会也存在相似阶层。韩国人口相当集中，特别是地方上的年轻人极力考入首都首尔的大学，毕业后也留在首尔工作，地方大学毕业生也纷纷往首尔挤。“僧多粥少”使得首尔的工作大体上分为“正规职”和“非正规职”两大类，后者不被视为公司正式员工，

也不享有任何福利，工资也比“正规职”低得多，只能勉强糊口。而现在的趋势是用人单位大量减少“正规职”的招聘，很多刚毕业的大学生只能做“非正规职”。韩国青年的失业率在各年龄段中一直居高不下，即使对找到工作的人来说，情况也不乐观。“减少非正规职，增加正规职”呼声经常出现在韩国媒体上，但企业还是无动于衷。

在俄罗斯和匈牙利等东欧国家同样存在与中国“蚁族”相似的群体。据记者了解，在俄罗斯，学习法律、经济等人文学科的大学生很难在家乡找到工作，到莫斯科淘金后竞争又太激烈，赚钱也不多。一位叫伊琳娜的女士告诉记者，她是博士毕业，工作两年，才有1000多美元的存款。为了能在莫斯科生存下来，俄罗斯的低收入大学生群体只能在莫斯科郊外租便宜房子，每天坐电气火车往来莫斯科与住处之间，耗在路上三四个小时。在早班电气火车上，记者曾听到一些年轻人发牢骚说，政府“把钱都拨到莫斯科”，“莫斯科人是寄生虫”等等。

中国“蚁族”在英国也有相似的“同类”，他们的名字“另类 iPod”显得更时髦一些，但这几个英文缩写字母背后却是一串令人心酸的解读：I 代表“不安全”(Insecure)，P 代表着压力太大(Pressurised)，O 意味着税收过重(Over-Taxed)，而 D 则是负债累累(Debt-Ridden)。

英国广播公司评价“另类 iPod”一族是“缺乏安全感、承受着巨大的负债压力”的一代。和比他们年长的人群不同，这些20岁刚出头的年轻人是在经济快速增长的环境中长大，却在经济恶化中被放到社会上发展，这导致他们在社会经验不足的情况下，1/5 负债超过1万英镑，1/3 没有任何存款，生活的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在经济状况和社会保障水平低于西欧的东欧国家，不少大学毕业生也面临困境。《ELLE》杂志匈牙利版说，当今很多年轻人决定不打开通向成人生活的大门，他们宁愿生活在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环境中，更多的人选择与父母同住，对走向社会和承担义务充满了惧怕。

“蚁族”短期内很难消失

与其他国家类似情况相比，英国智囊组织“改革”的社会学者汤姆林森认为，中国的“蚁族”

更加不容易。汤姆林森说，中国的问题首先出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大量的毕业生积聚在发达城市，而在欠发达地区的年轻人却又因为缺乏社会资金投入而被闲置。其次，中国“蚁族”的出现也反映出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不够成熟。他比较中英两国生活陷入窘境的大学生群体说，即使英国的年轻人再感到生活压力大，也不需要为教育、医疗这些问题操心，因为这已经被纳入免费的社会福利保障之内。不过，汤姆林森还是鼓励中国年轻人说：“尽管生活有时仿佛陷入停滞状态，但千万别放弃自己的梦想。”

在纽约这样的美国大都市，租住着鸽子窝一样又小又旧的房子、起早贪黑的年轻人同样不少。纽约的竞争某种程度上比北京等中国大城市更残酷，因为这里还吸引着世界各地的高智慧人群。正因为这样，纽约在人们眼中比任何其他城市都显得具有包容性。熟悉纽约的人会说：“在纽约，人人都是外来人口，但是生活在这里，你又最不容易察觉自己是外来人口。”《环球时报》记者在美国生活多年的感受是，美国的年轻人比国内同龄人要现实很多，更认同“无差别劳动价值观”。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社会学者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国外一些大都市也有类似我们低收入大学生群体生活在城乡结合部的现象，但北京等城市“蚁族”聚居的规模更大一些。这位学者认为，“蚁族”2003年开始出现，2005年形成规模，高校扩招只是促使“蚁族”出现的一个原因，从目前的形势判断，也与国家经济转型、城乡差距大有关。解决“蚁族”生存状态要有长远考虑，不仅是“80后”这一代，还要考虑他们的后代，要加强国内二三线城市建设，缩小城乡差距，吸引他们回去。他同时强调，关注这一群体不仅是社会和政府的责任，也是企业的义务。

《蚁族》主编、青年学者廉思1月5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国外也存在类似中国“蚁族”的现象，说明低收入大学生群体在各国存在一定共性，但中国表现出来的个性更鲜明一些。廉思认为，随着全球经济出现好转，“蚁族”现象会有所缓解，但短期内还不会完全解决，现阶段立即消失的可能性也很小。

(摘自2010年1月6日《环球时报》记者 古放等)

中国力量的三面

中国力量带给全世界的挑战,是如何有效地使用这种力量,而不是去驯服它。

中国不是,也不会成为另一个苏联。它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取决于中国未来的领导人、未来的国内发展以及持续变动的国际环境。正如本书的标题“军力、财力和智力”所提示的那样,中国已经从毛泽东时代对强制力量(军力和意识形态的强制运用)的过度依赖,通过邓小平时代对经济和财富力量的强调,转向当今领导人更加平衡的既重视经济力量又努力提高中国“理念力量”及军事力量的战略。中国不是苏联,不会成为军事巨人经济矮子;中国也不是日本,不会只有经济力量,而军事发展受到阻碍,延伸到国外的理念力量也乏善可陈。中国公开致力于成为全面大国。它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并不是苏联,因为它不会像苏联那样一味将重点放在强制力量上。中国则把宝押在全球化上,这个宝迄今而言是押对了。不像革命和冷战时代的苏联,中国过去的三十年,是与经济力量站在一边,这种力量形式最易转换,中国人将其作为战略基石。经济力量确实有最多的表达形式,能够有效地转化成强制力量和理念力量。苏联解体教会中国,对于强制力量的过度投资可能会损害经济能力和国内政治合法性,还可能衍生出反对力量,而国内积弱不振与外部压力积累,达到一定时候,将会导致政权更迭。相反,中国向外部世界开放经济,并允许其他国家在其经济成功中分一杯羹。

中国未来存在大量可能性。外部观察家和政策制定者应当对简单地将中国评价为“强大”或“弱小”的划分法表示怀疑。两种评价都有其危害。如果中国被认为是弱小的,有些人就会以不必要、不可能以及不计后果的方式去威胁中国。如果中国被认为是强大的,美国就会形成一种逻辑,去刺激一场毫无意义的军备竞赛,这只会削弱美国自己在经济和知识领域内的竞争力。在21世纪的头10年,许多美国人

对中国的三面力量的评价是错误的。美国人倾向于高估中国的军事力量,而在经济力量方面,又通常过分强调中国作为“卖者”的力量,低估其作为“买者”和“投资者”的力量。他们还倾向于低估中国在不止一个领域内的理念力量。

中国的国家战略不会只停留于获得或使用强制力,其对台战略可能算是一小部分例外。中国不是一个拥有超级能力的超级大国,即使当前的发展势头能够延续下去,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都不会成为超级大国。中国的每一种力量的多种表达形式都有其优点与弱点,对中国和外部世界都是如此。中国的最精确定义应当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它拥有大规模的智力资源,它有更大规模的国内贫困问题和其他弱势问题,这些问题将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纠缠住中国领导人,但是,中国的全球竞争力也是如此有规模,高质量而且充满活力,对于美国和其他国家而言,形成可怕的经济、智力竞争,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形成军事竞争。在价值增值链上处于更高级别的国家必须不断向上移动以保持住自身的优势。

如果美国将一个执著于其自身内部发展问题的经济和智力对手转化成一个国际敌人,那么美国无疑将铸成历史性大错。大部分伊斯兰国家如今已经对美产生敌意,而美国的二战后联盟结构亦已趋于松动,俄美关系问题百出,美国软实力千疮百孔,在这种情况下,与另一个横跨大陆、拥有充满活力的人口大国为敌,显然是鲁莽冲动的。中美冲突只能说明中美两大社会领导力的失败。

前面已经得出大量的关于中国力量的结论。首先,如果说人们普遍认为大型的多元化的利益分散的国家或组织很难发展、表达并持续实施大战略的话,那么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所作所为真的可以说令人惊叹。中国持续不变地强调经济力量,保持外交政策与经济发展需要相一致,在力量增长的同时安抚不安的邻国,在维持和扩大出口市场同时

保持外国技术和资本的流入。同样令人惊慌的是中国随着变化的环境而调整战略,首先通过扩大军事资源,然后通过增信释疑的措施,告诉国际社会这种力量增长不需要害怕。在中国国内,随着中产阶级和职业阶层的扩大,党逐渐吸纳这些新兴的社会成分加入。随着中国沿海城市的增长稳定下来,党又逐渐将重点转向那些落后地区和人口,这些转向的直接效果还有待观察。简而言之,在中国获得力量的过程中,人们看到了坚韧与灵活性的罕见的结合。

其次,维持必要的国内支持,既需要坚韧又需要灵活性,这中间的难度不容低估:经济改革和全球化给中国许多人带来痛苦,他们要求调整政策。正如一位资深中国学者所说的那样:“大量的期待落空了。国家机制较为脆弱。大量的不安分的群众……所以中国能否平稳走过这段过渡期,尚不可知。历史教训需要人们警觉。”

因此,中国宏观国家战略的主要威胁在于机制能力与不断上升的社会和国际需求之间的危险平衡。中国政治和政策体系一直处于过度负荷状态。老龄化人口,各种类型的资源和环境限制,不断上升的期望值,外部世界对于中国减少有害溢出效应的要求,还都只是加诸中国机制和中国领导人身上无限重负的一小部分。

再次,由于中国面临的大量内部挑战性质上均为长期挑战,因此,中国的外交政策将仍然会以是否减轻国内负担或是帮助国内问题可控制为目标。尽管中国将会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但国内需求的重担将会使中国参与处理长期国家间问题的积极性远比其他国家所希望的要低。外部世界有时会要求中国在国家间问题上出的力大于中国控制自身问题。

特别要谈到强制力量,中国有足够能力保卫祖国不受传统的摧毁政权的攻击。尽管中国正在增加应对传统攻击的威慑力,但中国并不愿意像冷战时期的超级大国那样过度扩张战略武器库。中国远距离部署传统军事力量的能力还相当有限,不过正在逐步增长,其指挥控制能力也向快速与智能方向发展。中国意识到,它必须为获得军事力量创造积极正面的环境,否则就可能导致不必要的军备竞赛,可能促发反华联盟的形成。中国正在将军事力量作为外交工具使用,以增信释疑的方式部署军事力

量,并与其他国家的军事部门互动。

但是,尽管中国很可能已经成为地区主导力量,但美国并没有被中国推出亚洲,亚洲也并没有变得以中国为中心。如果美国的地区影响力比过去有所下降,这不仅反映出中国力量的提升,也同样反映出美国在其他地方的政策、承诺以及义务的增多。中国希望提升其防范本地区威胁其核心利益的能力,中国也确实越来越有实力这样做。同时,几乎所有的中国邻国都希望美国在该地区的积极的、建设性的多方位的存在。

当然,会有疑虑。中国的民族主义就是其中之一,即使这种民族主义更多地关注强化和改变中国自身以获得安全,而不是去改变世界,更多地支持和保护国家和文化尊严而不是转化其他国家。获得安全并维护尊严的愿望如果被引入了仇外的轨道,则会以威胁方式表达出来。中国和中国人需要防范这种危险。相比之下,美国的民族主义通常试图通过改变世界而实现美国安全。正是从这片土壤上,生发出了全球民主推广和干涉主义的根芽。

从经济力量来看,大多数人都把中国力量与“卖家”力量联系起来,其实中国作为“买家”的力量才是其影响力所在。比如,在国际金融市场中,中国愿意调节其以美元、日元或欧元计算的债权持有,这使中国有了对美欧的杠杆,因为美国人想要他们的货币维持全球主导并且利率较低,而欧洲人则想与美国竞争,取代美国的货币垄断地位。中国投资国外的能力正在成为重要的外交资产,像非洲和拉美这样的地区,其他大国都被吸引过来,以相对不高的成本扩大影响力,中国在这方面的能力还是相当高的。中国可以放弃政治和环保方面的条件而提供援助和投资,这一点对于许多并不富裕的威权体制颇有吸引力。

中国力量的三种形式中最易被低估的就是理念力量,特别是中国改进生产过程和改造旧部件的创新力。当今世界越来越憎恨美国强制力量的使用以及利用制裁贫困国家以惩罚美国不喜欢的领导人的方式。在这种状况下,美国人很容易低估中国外交的全球吸引力。中国正在快速提升其全球交流以及文化传播能力,中国将比美国人想象的更有效力。

(摘自《中国力量的三面——军力、财力和智力》, [美] 戴维·蓝普顿著, 新华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

闲话古代官员的退休生涯

完颜绍元

古代“公务员”职业没有失业保障、没有连续工龄、也没有情义体恤，可以说是一个含金量较低的“瓷饭碗”。

无退休费、无工龄、无余荫： 含金量较低的“瓷饭碗”

秦汉时代，凡任公职、吃财政者，通称为官，除了替朝廷出勤打工外，别无脱离职务的身份和权益。当时的讲法叫“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近似今人帮老板打工的意思。一旦因奔丧生病、任满更替、罢免辞官等各种缘故退休，老板和雇员的关系即告解除。大体而言，可用“三无”概括：

一曰无退休费，就是无论原先俸禄多少石的官吏，只要离开职位，除非皇帝特诏照顾之外，一律停发俸禄。汉朝俸禄本来就薄，俸额低或负担重的人积蓄不易，所以不少官吏一旦休官停俸，就要另觅生计。

比如从小“好经书，通《诗》《礼》”的宋均，从十五岁入仕，官至河内太守，其间两次休官，一次是在做辰阳县长时“以祖母丧去官”，一次是在任东海相时“坐法免官”，从离职到再任期间，都是靠跑到颍川去做客座教授为学生讲学维持生计。

还有世代为郡吏的孟尝，在合浦太守任上因病辞职，因为没有收徒讲学的本事，只能下田耕作。有个在京师做尚书的同乡向皇帝推荐他重新做官食俸，皇帝不理睬，于是孟尝做了大半辈子的自耕农。

二曰无工龄，就是除了曾任二千石以上高官者在休官以后重新出任时，可授予“比六百石”职位以示优惠外，其他二千石以下的休官者，要想再当“公务员”，都得回到起跑线上，和普通老百姓一起竞

争。总之，既没有可以保留的干部身份，也没有可以累计的连续工龄。

三曰无余荫，就是人走茶凉，在职时候的特权和影响一笔勾销。“飞将军”李广卸任云中太守后，隐居蓝田南山。某日，他带一个随从外出饮酒，返回时已是夜晚，被正在巡夜的霸陵县尉大声呵叱，道是违犯宵禁，要依法处罚。随从讨情说：“这是前任李将军呀。”县尉毫不通融，道：“就是现任将军也不许夜行，何况是前任将军！”结果“飞将军”被关进警署（亭），拘留一夜。

顺便提一下，这一份没有失业保障、没有连续工龄、也没有情义体恤的古代“公务员”职业，可以说是一个含金量较低的“瓷饭碗”。有人做过统计：西汉时丞相一职的平均任期才四年多，东汉时三公的平均任期不到两年半。朝廷要官尚且如此，以下的自然就更惨了：二千石“时有纤微之过者，必见斥罢”，中低层官吏，则有“司隶、部刺史”等纪检官员随时“察过悉劾，发扬阴私，吏或居官数月而退”，就是动不动便打碎了饭碗。

单从制度上看，魏晋南北朝的退休待遇比秦汉好不了多少，当真照章办事的话，还比不上现代的失业者尚有低保可吃的境遇。扬州监察干事（从事史）何子平的母亲住在会稽，户籍年龄满八十岁了。按规定，儿子应该辞职回家，奉养老母以终天年。州府办公室主任（主簿）顾恺之说：“你母亲的实际年龄不到八十岁，亲友故旧都了解。在州里当差，好歹还有微薄的俸禄，一辞职就什么都没有了。我替你办个留任申请吧。”何子平不肯，说我们当干部的不能带头损害户籍制度的公信力。顾恺之又建议他回会稽后，在县政府求个公职，既可取禄，又方便就近奉养母亲。何子平还是摇头，说不能做这种投机取巧的事。何子平“既归家，竭身运力，以给供养”，即完全靠体力劳动养活老母和自己。

公车不能带走，看病自己买单

唐朝规定，异地做官，连最后一次坐公车返回故乡也不行。唐德宗时，太子宾客孔述睿因老病退休，皇帝为表示关怀，特命公车送回，那就是大家羡慕的荣誉了。到唐文宗大和三年（829年）四月，有个四品京官退休，要回故乡浙东养老，向皇帝中请说：家贫路远，请求皇上特批一纸能从长安到婺州一路乘坐公车的驿券。从此，凡“家贫路远”的京官退休，特许参照此例给予照顾。

宋代也实行退休就不得再用公车的制度，所以杨万里在临安当官时，早早就攒齐了能使全家人从临安返回故乡吉州的盘缠，锁进箱子，藏在卧室内。他还经常告诫家人，不许在外面购一物，惟恐一旦退休回家时行李超重成为累赘。

宰相富弼退休后定居洛阳，常穿着家居衣服，骑驴去郊外游玩。有一回他路遇水南巡检前呼后拥地出行，巡检是从八品小官，富弼虽已离职，但从二品官员的身份还在，自然不必特意从驴子上下来站在一边给巡检让道。为巡检开道的前卒大怒，厉声呵斥，急得他举鞭趋驴快走。假设富老坐在宰相级别的名牌车上，对方就不会当他是乡下土老冒了。

古代官员在职患病可享受公费医疗，一旦离职，诊疗服药都要花自己的钱。孟郊、贾岛都以诗风清峭瘦硬齐名，有“郊寒岛瘦”之称，又都是在副县任职上退休后因病交困缺医少药而死。还有名列“初唐四杰”的卢照邻，因患病辞去新都县尉一职，住在长白山草屋中养病。卢副县长没有家底，全靠朝中显宦不时送来药品衣物，才度过难关。

退休后的“房奴”生涯

自隋唐开始，官、职分离，所谓休官，其实只是休职，就是由于奔丧、病伤、候选、罢免、离任、致仕等各种缘故，脱离了能行使一定权力的职位（或差使）而已，但代表个人资格权利的官员身份依然存在。换句话说，秦汉魏晋的“公务员”休官以后就是平民（原有贵族身份者例外），从

隋唐开始，“公务员”休官（其实是休职）以后依旧是官，在许多方面享有老百姓企望不及的特权：比如涉及诉讼时可以不在公庭抛头露面，犯罪了可以用官告抵刑，又如住宅厅堂可以有几间几架，车舆骑乘可以怎样装饰，衣冠可以穿什么样式和颜色，乃至死后可以按什么规格办丧事、起坟墓，都可以根据官资高低采取与级别相应的排场。虽然说费用都需自掏腰包，但对比布衣即使有钱也不得僭越的种种禁限，“官有常尊”的身份意义就弥足珍贵了。此外，从唐代后期起，退休的官员无论级别高低，都可以享受“半俸”养老，更是过去连做梦也想不到的。但尽管如此，唐宋时休官的实际含义，也不止是失去了在某个职位上行使权力以及支领全额官俸的特权，比如——

古代官员授职有回避原则，就是不许在原籍或有家族产业的地方任职，所以当时的“公务员”如果经常在职的话，就得到处宦游，一方面少有时间精力在原籍营建房产之类，另一方面无论到哪儿工作，总有条件优越的官邸供你和家属居住。可是一旦休官，马上就得搬出来让给继任者。而且往后定居何处还有限制，比如南宋规定，凡各级地方政府官员休官后，三年内不许在任职地居住，倘在当地有亲属，或置有财产，三年以后也不许居住，违反者处一年徒刑。所以若要盘点休官所带来的实际损失，迫在眉睫的就是再也不能继续居住设备齐全的官邸了。

宋仁宗时做过宰相的杜衍，因为一生“不殖私产”，退休后只好长期借居南京（今河南商丘）车院（教习驭车技艺的单位，近似后世的驾校），直到去世，“第室卑陋，才数十楹，居之裕如也”。

宰相尚且不能占住官邸，其他休官者当然更得靠自己设法解决居住问题。苏辙退居许州后，眼看李方叔起盖新居，羡慕不已，“我年七十无住宅，斤斧登登乱朝夕……不如君家得众力，咄嗟便了三十间”。于是他决心盖房，享受一下老有所居之福，“平生未有三间屋，今岁初成百步廊”。不过心愿满足了，一生积蓄也耗尽了，“盎中粟将尽，囊中金亦殫”，于是又自责“我老不自量”，到了这把年纪还来做房奴。

（摘自《人民论坛》2009年12月（上））

昆明公职人员 劝酒将被问责

昆明市公职人员在工作时间饮酒、在公务接待中强行劝酒和逼酒者将被问责。近日，昆明市出台针对公职人员的“戒酒令”，在全国首开公职人员劝酒挨罚先河。

昆明市委办公厅、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下发《规定》，明确国家工作人员不准在工作时间饮酒，不准在值班和执行公务时饮酒，不准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辆，不准在公务接待中强行劝酒和逼酒，不准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酗酒。年度内一次违反规定的进行诫勉谈话；二次违反规定的，给予通报批评；三次违反规定的，调整工作岗位或停职检查。酗酒和酒后驾车，造成恶劣影响和严重后果的，视情形按党纪政纪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该规定同时明确，公职人员在公务接待中强行劝酒，导致对方身体健康受到损害的；影响对方正常履行公务职责，损害机关形象，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致使对方酒后产生违规违纪违法行为的；因劝酒导致对方言行失控的；故意用语言挑逗、刺激、要挟对方饮酒的；在对方已醉酒、意识不清、失去自控能力的情况下仍强迫其饮酒的；对方因身体原因不能饮酒，仍强迫其饮酒并诱发疾病的；对方不善饮酒，仍对其逼酒，并造成醉酒滋事或人身伤亡的；对方为驾驶人员或即将驾驶车辆的人员，仍对其逼酒造成酒后驾车的；其他因逼酒导致对方言行失控，造成不良影响的，都将被问责。

（摘自2009年12月21日《中国改革报》）

重庆法院推行领导干部 “单方退出”机制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钱锋12日称，重庆法院将从2012年起全面推行法院领导干部“单方退出”机制，保证司法公正。

钱锋在当日召开的重庆市法院院长工作会上作出如上表述。钱锋说，为提升司法公信、构建公正廉洁的司法新机制，重庆法院将健全物理隔离机制。从今年开始，重庆法院全面推行法院领导干部“单方退出”机制，对配偶、子女从事律师职业的人员不再作为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的提名人选。

钱锋称，对于已经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也将执行此制度，或本人选择辞去领导职务，或配偶、子女不再从事律师工作，未来“单方退出制”也将作为招录或调入工作人员的前置条件。

对饱受诟病的离职法官在原法院代理案件问题，钱锋说，重庆市各法院工作人员离任后均将不得担任原法院案件诉讼代理人或辩护人，不受两年离任年限的限制。对离任法官开办的律师事务所所在原法院代理案件的问题也将要严格限制。

（摘自2010年1月12日《中国新闻网》）

宁夏将专项治理 跑官要官“顽症”

为了切实营造风清气正的选人用人环境，宁夏回族自治区将严肃整治跑官要官、拉票贿选问题。在近日召开的宁夏贯彻落实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工作会议上，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徐松南这样表示。

徐松南说，用人上的不正之风是个顽症，干部

群众深恶痛绝。中央提出的目标是，到2012年，用人上不正之风得到有效遏制，初步形成比较完善的防止用人上不正之风的长效机制。

在开展整治跑官要官、拉票贿选时，宁夏回族自治区将坚持堵疏结合。

既要“堵”，即严明纪律，严格执行违规用人立项督察制度，对跑官要官、买官卖官问题进行专项治理，坚持有案必查，查出一起处理一起，处理一起通报一起，让搞不正之风者得不偿失。同时，也要“疏”，即为干部搭建公开表达意愿和展示才华的平台，让干部公平有序地参与竞争。

徐松南强调，对待跑官要官、拉票贿选者，不但要对其本人进行查处，对帮助其弄虚作假者也要进行处理。

（摘自2010年1月18日《法制日报》）

政府采购人员与供应商负责人

不得有三代内 旁系血亲关系

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规定，政府采购人员及相关人员不得“与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有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及姻亲关系”。

征求意见稿对法律规定中的采购人员及相关人员与供应商之间的“利害关系”进行了明确规定：指采购人员及相关人员现在或者在采购活动发生前三年内，与供应商存在雇佣关系；现在或者在采购活动发生前三年内担任供应商的财务顾问、法律顾问或技术顾问；现在或者在采购活动发生前三年内是供应商的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与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有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及姻亲关系；与供应商之间存在其他影响或可能影响政府采购活动依法进行的利害关系。

（摘自2010年1月14日《文汇报》）

第二次全国经济 普查结果公布

修订后的2008年全国GDP总量为
314045亿元

日前，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发布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全国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公布如下：

查清了主要总量指标

2008年末，全国共有二、三产业的法人单位709.93万个，与2004年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相比，增长37.7%。二、三产业活动单位886.4万个，增长29.9%；有证照的个体经营户2873.73户，增长31.4%；企业法人495.9万个，增长170.9万个，增长52.6%。

全国第二、三产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额为207.8万亿元，比2004年末增加111.1万亿元，增长114.8%。

查清了主要经济结构

在全部第二、三产业法人单位中，企业法人占69.9%，机关、事业法人占13.5%，社会团体和其他法人占16.6%。在有证照的个体经营户中，第二产业占8.8%，第三产业占91.2%。在企业法人

单位中，内资企业占 96.3%，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 1.7%，外商投资企业占 2.0%。

在全部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中，第二产业占 48.8%，第三产业占 51.2%。在单位从业人员中，人数最多的五个行业是：制造业占 38.2%，建筑业占 14.3%，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占 8.2%，批发零售业占 6.9%，教育占 6.3%。

企业资产中，国有企业占 23%，比 2004 年下降 8.1 个百分点；股份有限公司占 28.7%，比 2004 年增加 7.7 个百分点；私营企业占 12.3%，比 2004 年增加 3.3 个百分点。

企业实收资本中，国家资本占 33.4%，集体资本占 3.0%，法人资本占 25.5%，个人资本占 22.9%，港澳台资本占 6.1%，外商资本占 9.1%。

查清了能源生产及消耗总量

2008 年，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为 26.5 亿吨标准煤，其中原煤产量 28 亿吨（实物量），天然原油 19505 万吨，天然气 803 亿立方米。能源消费总量为 29.1 亿吨标准煤。

同时，依据国内生产总值（GDP）核算制度和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按照国际惯例对 2008 年全国 GDP 初步核算数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 2008 年全国 GDP 总量为 314045 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为 33702 亿元，占 GDP 的比重为 10.7%；第二产业增加值为 149003 亿元，占 GDP 的比重为 47.5%；第三产业增加值为 131340 亿元，占 GDP 的比重为 41.8%。

此外，根据经济普查能源消费调查结果，2008 年全国能源消费总量调整为 29.1 亿吨标准煤，比已公布的初步数据增加 2.12%。同时按照通行做法对 2005 至 2007 年能源消费总量数据也做了相应修订。根据修订后的能源消费数据和 GDP 数据，2008 年全国单位 GDP 能耗比上年下降 5.2%，比 2005 年下降 12.45%。

（摘自 2009 年 12 月 28 日《今日信息报》）

中央纪委监察部通报 2009 年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

去年 7036 名 领导干部被问责

中央纪委监察部 1 月 8 日召开新闻通气会，中央纪委副书记李玉赋通报了 2009 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李玉赋介绍的主要情况有：2009 年，各地区各部门扎实开展党风党纪和廉政教育，增强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意识，提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自觉性；加强领导干部党性修养和作风建设，着力解决领导干部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采取有力措施，扎实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取得初步成效；强化对社保基金、住房公积金、扶贫资金和救灾救济资金的监管；从源头上治理公路“三乱”工作力度加大。

■ 2009 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办公款出国（境）旅游案件 103 件，涉案人数 319 人，追缴涉案金额 537.1 万元。

■ 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有关规定，对 7036 名领导干部进行了问责。

■ 2009 年 1 至 11 月，全国共查处商业贿赂案件 13858 件，涉案金额 32.9 亿元，其中涉及国家公务员的案件 2906 件，涉及国家公务员 3202 人。

■ 全国各地共查处“四项资金”管理使用中违规违纪问题 4245 个，涉及资金 44.5 亿元，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或其他处理 1574 人。

■ 各地取消涉及交通和车辆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 217 项，涉及金额 392.49 亿元；取消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站点 1430 个。

（摘自 2010 年 1 月 9 日《文汇报》）

路的感悟

杨树荫

一

人世间，最离不开的，便是路。

大路、小路，山路、平路，曲折的路、通天的路，人走出了路，路便让人永无穷尽地走下去。

天下熙熙，皆在路上。

二

世间最早的路，大概始于丛林深处，由人与各种动物奔突追逐出来的。万物竞荣，物竞天择。人，靠着挺起了腰杆，堂堂正正地直立于天地之间，才能以强者的姿态走出丛林。

从此，人便有了各种各样的路。

路是由挺直腰杆的人走出来的。人一旦弯下了腰，便失去了路。

由此，我们大抵可以说：路，由直立者而立；路，又为直立者而行。

三

人走出了第一步，便开始了自己的路。

人对路充满了憧憬，路让人回到了现实。

人总想有平坦的路，安宁的路。然而，路却总是艰险的，无尽的。路，总在风雨中。

人总想着往上走的路，往高处走的路，总想一步登天。然而，路却只能往前走，一直走。路，总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人总想靠路把人带出去。然而，路总是靠人的脚去伸展。

人总想有一条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路。然而，路却总是有规则的、有约束的。

四

人愈年少，似乎路愈多，其实是人的幻想多，以为天下之路皆可行。

人愈年长，似乎路愈少，其实是人现实了，人所认定的路只有一两条。

五

有了路，便有了历史。

国之兴亡，人间悲喜，多少撼人心魄的瞬间，尽在路上演绎。

有悲壮的历史，必然是尘土飞扬，兵火搏杀，进退，全是血路；

有苦难的历史，必然是饥民流离，哀鸿遍野，左右，尽是死路；

有辉煌的历史，必然是金戈铁马，势不可挡，前后，欢声铺路。

以路观史，一部中国的文明史，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的苦难之路、中兴之路、强国之路。

六

路，一头连着历史，一头向着未来。

路是见证者，路是奉献者。

在农耕时代，我们看到了泥路、土路、乡间的小路。

在工业时代，我们看到了公路、铁路、海路、空路、通往全球的路。

在信息时代，我们更有了全新的路：波段、频道、网络，把每一个人连在一起。

路造就了时代，时代拓展了路。

七

路遥遥，路漫漫。路载人，人行路，大路朝天，直指苍穹。

永远的路，永远的人；永远的脚步，永远的车轮。

永远，永远，永远……